



# 简介

“长江产经圆桌会”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根据网络信息时代学术交流和信息传播的特点，在全国首创的线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政策研讨活动。它由院长刘志彪教授牵头，定期围绕政府重视、企业关注、民众涉及的重大经济事件和热点话题，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广邀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家独立发表真知灼见。该圆桌会近年来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为出发点，以服务中国政府战略决策为宗旨，以引导社会舆情为己任，秉持“热情·专业·理性”的理念，寻求理论分析、政策阐释和应对策略。

收录本集的这些文章，经长江产业经济院官方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推送，共获得了数十万点击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及良好的舆论效应。我们将以往的研讨内容按年度汇编成册，作为长江产业经济院研究成果之一，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以飨读者。



# 目录

1 苏州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的密码和启示	01
2 国家战略区域的联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	12
3 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战略的影响和我国的应对	18
4 为什么说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新计划经济？	25
5 县域城镇化：何以高质量？	35
6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40
7 全球化的趋势与中国的方略	47
8 全国统一大市场，究竟要统一什么？	53
9 苏州上市公司数地级市排名第一的密码	58
10 如何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63



# 苏州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的密码和启示

2022年1月1日

**编者按：**苏州市是中国重要工业强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国第三大出口城市、长三角第二大中心城市。2021年12月29日苏州市官方账号正式公布：今年苏州工业终于突破了40000亿，规模也正式全年超越上海、深圳，正式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今年前三季度苏州工业规模增长20.5%，上海增长15.2%，深圳工业增加值增长4.8%，由于苏州工业增速远高于上海深圳，工业规模超过上海、深圳毫无悬念，这也是苏州近年来首次工业总产值全年超过深圳、上海。

4万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华北第一大工业城市北京工业的2倍、华南第二大工业城市广州工业的2倍、西北第一大工业城市西安工业的6倍以上，苏州为祖国建立起庞大、先进、完善的工业体系。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苏州在纳米技术、生物医药、高端纺织、优特钢铁、通信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制造、区块链、航空制造已经处于亚洲一流水平。全国民营制造五百强苏州拥有23家数量全国第二，拥有全国最多的百强先进制造园区，值得一提2021年科创板新上市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可见苏州的科技实力有多强。

最近十年苏州市特别重视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高科技的发展，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航空制造等先进制造业。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生物医药的产值规模已经达到2000亿左右的规模。今年国家也明确大力支持苏州的生物医药、半导体制造、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科技产业发展。

苏州的工业崛起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工业强大的重要象征。为此，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组织学者、官员、企业家就苏州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的密码和启示展开了讨论。

##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个人认为关键的密码在于三点：（1）离上海近；（2）与上海有效协同，形成了制造成本低和生产性服务便利的“双轮驱动”效应；（3）链接上海进行高水平开放，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享受到了全球化红利。

启示：应在全国各个区域形成类似于上海—苏州这样的城市群“雁阵模式”，即打造一个

面向全球的高度开放的中心城市，大力发展城市功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供高水平生产性服务；同时，在周边发展若干制造型城市，致力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完善相关配套并优化营商环境。

**踪家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长三角一体化，在于沪苏进一步形成了高端服务与高端制造的双城模式，因此苏州的成功不仅是苏州与江苏的成功，更是上海的成功，长三角进一步一体化的成功，是集聚匹配的成功！

启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分工：首位城市在制造业上的不作为、少作为，其他城市在高端服务业上的少作为、不折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匹配发展共同迭代。

**白明（商务部研究员）：**

苏州在这一刻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城市，但苏州的成功则并非一时一刻之功。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完美地将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海产业的机会溢出以及外资企业落地带来的开放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驱动苏州产业发展的三大动力源。相比之下，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则构成了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新平台。除此之外，对于人才的重视也让苏州的经济活力更具有人文色彩，特别是体现在创新驱动之上，使人才的作用不仅仅是发展不可或缺的高端人力资源，更是建设苏州、提升苏州的资源优化配置谋划者、执行者、受益者。

启示：在长三角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苏州不仅要用好上海的近水楼台之地利以及地处苏南的人杰地灵之便利，而且也要有能力争取更多海内外的“远水”来解本地发展瓶颈的“近渴”，而“远水”不仅包括资本、技术，也包括人才。苏州必须要有海纳百川之胸怀，将长三角发展的大局与本地优势结合在一起，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天时”中形成发展“地利”优势与五湖四海之“人和”优势的优化整合。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苏州是国际产业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最重要的窗口。以日资为例，仅高新区一地就有 600 家日企入驻，其中不仅有跨国龙头企业，也有大量中小供应商。他们面向中国市场，深入本土供应链，与包括苏州本土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分工合作，协同创新。这一高度国际化，又根植本土的产业生态系统，是苏州问鼎全球最大工业城市的关键性因素。

启示：苏州的成功，是刘志彪院长一直强调的，以中国市场整合全球创新制造资源的新型全球化路径的典型案列。

**霍伟东（辽宁大学）：**

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处理的极好。政府致力于服务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要素。企业缺什么，政府忙什么。政府最大限度的尊重市场规律，且具有持续性。

启示：具有全球视野和尊重市场的且持续坚持正确理念的政府，发展成什么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真正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与企业关系，政府不是向更上一级去要资源要政策，而是尊重市场规律向市场学习，服务于企业发展去满足全球大市场之需。

**周晓平（江苏省委党校）：**

坚持制造业立市强市兴市，把实体经济做实做优做强！

启示：正确选择硬科技产业；坚持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不随意干扰企业经营；积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利用人、财、创新平台等把全球创新资源集聚起来，科技为产业赋能；盯住硬科技产业，坚持长期主义，按照产业发展阶段及时有效提供产业所需各类公共服务，打造健康产业发展生态，实现多方共赢。

**徐天舒（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

苏州工业发展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早期的“星期天工程师”模式，得益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造就的苏南模式，得益于90年的产业园区开发，更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重点发展外资企业。此外，苏州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注入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工业园区经验之后，诞生了现代“苏州精神”——崇文睿智，开放包容，争先创优，和谐致远，也助推了苏州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启示：（1）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苏州的一系列成就，主要建立在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之上。（2）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不放松。苏州作为一个地级城市，正是抓住了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只问耕耘不问结果是才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成立、苏州生物医学产业的发展都是明证。（3）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之路。苏州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280.8%，现今也仍高达114.3%。必须走双循环发展之路，对外工业出口，对内工业配套。（4）坚持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并行发展。例如，苏州建立了一系列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企业的制度，多年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鼓励。（5）坚持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苏州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加快建设新农村建设，建立了树山、旺山等特色小镇；加快建设生产性服务业，既支撑了工业发展，又实现了产业升级；同时苏州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打造沪苏同城，走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包卿（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中心）：**

（1）强劲的国际国内制造业双循环枢纽，苏州不仅是外资集聚高地，也是民营企业集聚高地，是国际国内制造业价值链枢纽；（2）高度扁平化和专业化的县域经济支撑支持，苏州下辖的昆山、太仓、张家港和常熟，以及市辖区中吴江、相城、吴中都有高度专业化、集群化的制造业，形成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区域化协同发展体系；（3）国际化枢纽平台，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的合资集聚、太仓的德资集聚高地，形成高度的全球与地方互动发展系统，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在高度吸纳集聚全球市场、信息、人才、资本的同时，发挥区域化产业网络优势，互动支撑支持形成全球地方化的优势发挥与循环发展系统。

启示：推动发展的深度市场化、高度国际化和基础法治化。

**张为付（南京财经大学）：**

（1）苏州毗邻上海的区位，使其可以触摸到全球需求的制造神经。（需求侧信息搜集）  
（2）苏南人民的智慧与勤劳虹吸了周边的要素。（供给侧要素组织）（3）苏州市政府的诚信与高效，吸引了世界产业资本集聚。（国际要素整合）（4）苏州的便利物流条件，扩大了制造产品的辐射效应。（制造业外部环境打造）

启示：信息、要素、诚信、能力是一个城市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顾建强（扬州大学）：**

重视产业开放与内生创新动力平衡，政府具有前瞻性规划，优化产业链整合和布局。

启示：开放，吸收，赶超。工业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是看工业的产业基础，离开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只能是空谈，制造业不强，靠房地产支撑，城市经济迟早坍塌，失去竞争力，难以强大！

**张得煜（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1）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苏州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素以“崇文重教、人才辈出”而闻名遐迩，可以说重视教育是苏州人历来就有的文化基因。早在1994年，苏州就率先启动教育现代化工程，经过长期的坚持和不断探索，通过教育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提高了苏州教育现代化整体水平，也奠定了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的人才基础。

（2）苏南人特有的工匠精神

苏州今天的辉煌离不开众多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他们一代又一代，用自己精湛的技艺、敬业的精神，将心血和智慧投入所从事的行业中，充分发挥了工匠精神，打造了“苏作”品牌，

创造了人间天堂，这是苏州文脉在制造业领域的重要体现。

### （3）国际化的视野

苏州工业园区始建于1994年，是国内较早实现与国际市场直接对接的地区，从那个时候开始，苏州的目光就盯着全球市场，就有了国际化的视野，这种国际化的思路和眼光早已经根深蒂固。苏州完全可以按照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进行自主规划。这正是苏州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

### （4）重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通常把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技术聚集在一起，从而激发出最佳效能。企业之间能够形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产业链之间的有效配合，实现供应链的最优模式，最终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经营风险，增加企业利润的目标。苏州工业园区始建以来，全区有超过600家外资企业，投资来源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涵盖16个行业企业，包括：电子、医疗、信息化、新能源等，从而形成了高效的产业集群。

启示：重视教育、根植制造业、弘扬工匠精神、发展产业集群。

##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一是企业家精神充沛。苏州是苏商——洞庭商帮的发源地，也是近代全国商帮中转型最为成功、变身现代企业家的高地，改革开放前后，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发达，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农业工业化转型奇迹，而乡镇企业转型，民营经济的发展都非常迅猛，创造了张家港精神园区经验昆山之路等。

二是开放国际化程度高，苏州的一些县区，与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业紧密联合，配套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制造技能制造业水平，开创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创新，并面向全国和海外发展产业基地，也是民营企业最早的在海外开设工业园区的，是“一带一路”和“双循环”的先行军、大有作为者。

三是苏州工业是干部水平的体现。干部是苏州苏南模式的开创者，也是这个苏南模式在新的时代的升华者。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有干事业、干成事业的高素质、进取心，他们既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也是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者，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四是更快的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苏州工业总量高，增量快。苏州的一家民营企业如恒力集团，它一年的营收就相当于西部某省全部100强总量的三倍。而这样的发展速度、发展优势、发展总量，将继续持续下去。实现更高质量、更快的发展，苏州也一定会更加东西联手，面向全国，跨地区一起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启示：一是干部要勇于和专于经济建设。二是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创建优质尊重企业家的环境。三是要继续加快改革加大开放步伐，以更好的国际化促进高质量。四是经济文化整体提升，有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的长远规划和优良政策环境，形成对各层次人才的强吸引。

**余亦民（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借鉴新加坡招商和管理模式的苏州工业园区，为苏州大市的发展树立了旗帜和风向标。苏州所辖区都在这个发展逻辑的影响下，积极吸纳科技和先进制造业落户。没有政府规划的产业，没有政府培育的龙头，一定数量和高质量的企业聚集，自发形成产业生态，自治发展。

启示：苏州第一次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是在 2008 年，也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建立才几年的时候，此后保持的第一可以理解为模式惯性。其间的启示就是政府积极招商积极服务，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提供配套支持。苏州除了因为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宣称自己是历史文化名城，从来不宣称自己是什么“光谷”、“药谷”或者什么行政规划的产业主导型城市。苏州就是提供一片沃土。

**邵斌（苏州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依托上海，交通优势，文化底蕴。

启示：建立优良营商环境。

**朱天一（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苏州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纺织、面粉、化工等民族工业。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外向型经济的突飞猛进，再到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苏州工业体系从“一无所有”到门类齐全，规上工业总产值首次迈上 4 万亿元新台阶，其成功密码在于超前的全球战略视野、根植本地的产业创新网络、以及蕴藏在产业创新网络中的独特文化基因。

一是全球战略视野，早在 2006 年前后苏州就借鉴新加坡城市产业发展的经验，选取了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一系列新兴产业，早期迭代布局，从政策支持、补贴、管理规范，到引导基金的设立上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与投入。二是根植本地的产业创新网络。苏州拥抱大院大所，创新引擎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通过与大量风险投资、各种专业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孕育了苏州独有的产业社群和创新网络。过去五年，苏州不断拓展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模式，着力适应创新需求，累计与大院大所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14000 多项，项目总经费超过 300 亿元。三是文化产业基因。苏州本是吴文化核心地，风物清嘉，人文灵慧，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人民凝练出了昆山之路，张家港精神和园区经验“三大法宝”。从积极主动争取建立全国第一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到国家没有批准，自费建设第一个开发区昆山开发区，再到张家港最早拿到全国文明城市的，靠的就是不等不靠，敢想敢拼的精神，这些精神蕴藏在苏州本地产业创新网络中，形成了苏州独特的文化产业基因。

启示：（1）封闭保守没有出路，唯有放眼世界、早期迭代布局，才能赢得细分赛道的优势。（2）需要科研单位、企业、政府、社会团体共同协作，形成强大的产业创新网络，在部

分高精尖领域逐步打造完善的产业链，才能实现产业结构跃升、互利合作共赢。（3）不断探索和突破，坚持对了就上，错了就改，尝试各种可能性，才能与时代同行并进，促进国内外资源高效配置。

### **姜能涛（苏州石湖智库）：**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政府高度重视创新主体和载体培育，引导全社会加大对科研技术研发投入，目前已有先进技术研究院 47 家，高新技术企业 9772 家，以创新引领发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能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服务对外开放，在工业园区、保税区、自贸区、中外合作示范区等各级各类开发园区建设中取得多个全国第一，各类外资地区总部、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均处于全国前列。

启示：营商环境至关重要，深刻理解“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这句话丰富内涵，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解放生产力和提高综合竞争力，这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政府要做好“店小二式”亲商服务。

### **王昊（恒丰银行）：**

客观原因：地理位置好，人口素质佳，苏州是历史上的鱼米之乡、富裕之地，有浓郁的商业传统。社会文明程度高，比邻上海，是海派文化和内陆文化的交汇点。中新合作的工业园区开发，是苏州快速融入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化大舞台的重要推手。主观原因：政府角色定位准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支持各类民营、外资发展，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显著不同在于，苏州政府严守行为边界，区域法治文明程度高，政府能够做到服务不越位，引导不干预，甘当企业的店小二。政府的治理水平优秀，是外资、民企投资聚集苏州的重要原因。苏州还有一个特点是，下辖县市的工业实力都较强，在内部形成了激烈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化无形的手，推动形成了若干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另外，苏州政府官员基本为本地成长人士，受惠于苏州社会整体高教育水平以及优异人文环境，各级干部综合素质高，思想开明，决策科学、有国际化视野，是苏州成为国际第一大工业城市的重要法宝。

启示：在不考虑地理、历史差异的情况下，政府科学治理能力、科学治理水平的差异，是地区间竞争差异的主要原因。

### **司增绰（江苏师大商学院）：**

苏州是我国工业化较早的地区之一，具有产业发展历史和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基础较好。苏州毗邻上海，能够紧跟我国改革开放步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优势明显。苏州中高端制造业集聚，能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形成较大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能够较好地互动发展。苏州具有相对充足和水平较高的产业技术，使得产业转型升级有方向、有空间、有目标，产业

转型升级较为成功。苏州能够吸引集聚经济和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源比较丰足。苏州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和产业发展政策创新比较积极主动，政策执行落实比较到位，营商环境较好。

启示：城市要有持续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才能使产业升级有方向、有空间、有目标，城市才能顺利地实现产业更新与转型，才能从生产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优渥的资源禀赋。苏州紧邻上海，接受上海的经济辐射，这是苏州制造业成长的一个天然的禀赋优势，又加上苏南有良好的企业家精神。（2）良好的营商环境。经过多年发展，苏州打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大量的优质劳动力和资本，形成了自己强大的产业集聚区以及产业供应链体系。（3）面向世界的双循环体系。苏州制造业一直是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双循环体系，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得苏州制造业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取得市场规模效应。（4）双强体系。苏州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市场体系，以及地方政府强大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苏州工业园区的创立与运营为其制造业的腾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启示：（1）必须建立双强体系，即强大的市场体系以及政府强大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能力很重要，这是形成地方产业集聚与发展的基础。（2）必须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的双循环体系，在做强做大国内产业链、价值链的同时，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3）必须全方位提高营商环境，这是吸引优质生产要素，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关键还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江苏提出的“两争一前列”的重要指示，始终牢记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并紧密结合苏州实际，聚力制造业，聚焦高科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把它们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

启示：一是珍惜雄厚的工业基础，不要轻易转型或放弃。二是直面技术封锁外需受困的现实，加大技术投入，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顺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势，不断开辟新的市场。

**滕霞（南通环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崇尚敬业的历史传统、勤劳开放包容的现实追求。

启示：苏州包括姑苏区、虎丘区、吴中区、相城区、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昆山市、太仓市。改革开放后，除了一部分历史悠久著名旅游区，其他都已陆续发展成是集聚大、中、小型企业集群的工业乡镇和城市。他们大致有以下特点：（1）乡镇企业与科技结合的特点：乡镇企业的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对便宜，地理上又邻近上海，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的获取渠道直接、方便快捷。（2）各县区均衡发展，并且有自己的创业群：昆山以台企和外贸订单

形式为主；太仓以港口和上海外迁小型企业经济以及上海城市建筑工程为主；张家港以机械和纺织业为主；常熟以服装市场、服装品牌及机械为主，常熟的波司登羽绒产品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吴江集聚亚洲最大梭织面料、里料织造基地和以盛虹为首的印染产业。（3）苏州经济有较好的基础，历史上巨贾云集，自古以来很少有自然灾害和战乱，经济建设稳定、历史人文深厚，人才辈出，这些杰出的乡贤对家乡的建设，帮助很大。较强的崇商理念和良好营商环境形成了工业商业发展的肥沃土壤。（4）苏州人自古勤劳节俭，开放包容。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全球更多优秀人才，外来人才在这里不仅获得苏吴文化的滋养，同时给这片土地带来新的科技信息和技术。内外文化、信息、产业交融荟萃，在这里形成良性循环。

### **王海平（21世纪经济研究院）：**

一是，始终确保制造业占比维持重要比例；二是，发展制造业可与上海实现错位，发挥出苏州的优势；三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制造业可以实现“重资产”，更加有效发挥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四是，历史以来的工业基础。

启示：为中国如何实现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提供了样本。

### **杨建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拥有28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全国之最。决定了城市民营制造的实力与活力。（2）领先的科技创造了全国先进的制造集群。如纳米新材料，生物技术。（3）拥有8个全国百强先进制造园区。（4）苏州在AI、新一代通信及信息技术及新能源高科技领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已从代工城市发展成为高科技含量非常高的现代大都市。

启示：（1）提升营商环境，激发民营企业活力。（2）利用领先科技创造高质量的制造产业集群。（3）积极提升和发展新一代领先新技术（包括AI、通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4）先进制造集群向先进制造园区集聚，发挥高质量产业集群效应。

### **胡艺（苏州市职业大学）：**

借鉴+创新+人文及区位优势+优质政策+真抓实干等。尤为重要的是服务型地方政府及优质政策的供给。苏州产业整体转型升级、产业聚集以及苏州园区、昆山、高新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均有苏州政府的烙印：大量调研，不断调整及找准产业发展方向，长期规划，合理布局，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地区经济发展必备的资金、人才、项目等汇聚起来，一起发力。

启示：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有效优质的制度供给。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于市场中各种组织的选择行为产生约束的规则以及制定这些规则的制度，因为这些规则和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各个交易主体的行为选择以及生产经营活动，最终

影响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闫浩（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1）社会经济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人力资源，政府服务等等。（2）区位与地理条件：毗邻上海，通江达海，平原地形。第（1）条可复制可推广条件，第（2）条难以复制。

靠近上海可以接受中心城市辐射，拉动苏州制造业发展，同时抑制苏州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通江达海增强苏州与外部世界的通达性，降低物流成本。平原地形提高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增强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比浙江山地丘陵比重大）。

启示：毛主席说，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薛建明（施沃特策略中心）：**

一是开放与创新共同驱动发展。招引国际制造巨头走上发展快车道，增速放缓情况下仍对制造业的坚守，同时精准布局前沿产业，长期主义思维不断引导新兴产业发展。二是产业链集聚布局和城市功能扁平化之间协同、错位发展。苏州在各个产业，产业的各个环节均有良好的产业链，苏州的第一不是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园区的第一，没有城市商业的核心，城市内部产生协同效应。三是苏州政府勤劳奋斗，服务企业意识贯彻始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准、高效率服务落实企业需求。

启示：一个城市政府对产业赛道布局选取，即自身在产业领域内极具专业素养，科学系统思维谋划。

**许怀康（南京荟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九十年代初期苏州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启动开发，通过招商引资把欧美、日韩、港台很多优质企业引入苏州，除了带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人才、管理模式，为后期发展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2）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早期蓬勃发展，很多企业都成为了后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典范，是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企业的主力军，是苏州工业发展的基础；（3）苏州近十几年明晰的产业定位，政府坚持大力度的扶持政策，使得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科技等重点产业方向得到了迅猛发展。

启示：（1）苏州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贡献了大部分的发展数据，这表明他们才是苏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的宝贵源泉；（2）历届政府精准和持续的产业定位和大力度的政策扶持，是苏州抢占产业高地的有力保障。

**陶建伟（东曜制药）：**

苏州市独特的城市“四大特质”，包括：开放实干的城市精神、前瞻性及系统化的城市规划、亲商服务的营商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苏州开放实干的城市精神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地方产业注入了向上的灵魂。前瞻性及系统化的城市规划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及配套服务，有利于产业孵化与壮大，这对于周期长的产业显得尤为重要。高效、亲商的营商环境可以有效降低“政策成本”，为产业发展添能助力。苏州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的创业者和劳动者，使其移居落户、安心创新创造，为苏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促进了苏州市各个行业发展。

启示：城市发展是系统化工程，应以务实和服务态度做好整体规划，为产业发展提供创新、包容和开放的环境。



# 国家战略区域的联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

2022年3月15日

**编者按：**我国国家级区域战略可以概括为三区两流域：“三区”分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两流域分别为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本期圆桌会围绕“国家战略区域的联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了研讨。

## 包卿（江苏长江产经院无锡研究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是我国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但是，全球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顶级城市之间、都市圈和城市群之间的竞合联系。根据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全球科技集群100强中，东京—横滨城市群名列第一，然后是深圳—香港—广州、北京、首尔和圣何塞—旧金山，上海居第8位。粤港澳和长三角核心城市之间联系要不断加强，需要解决单个城市、城市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实现国家战略区域和国家总体战略的互动。站在我所处的无锡视角来看，需要拓展三个层面的“朋友圈”，首先区域层面，加强对接长三角核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着力推动苏锡常都市圈一体化，积极推进锡常泰、苏锡通泰、环太湖城市群等不同尺度的城市间合作；二是国家层面，作为国家重要城市，积极对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实现战略联动，主动承担国家战略功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产业领域构建战略联盟，在产业政策、人才培养、信息交流、国际国内论坛和展览会等方面实现联动联盟；三是站位国家“双循环”新格局总体战略，实现国际国内的双向“链接”功能，要丰富和提升城市的功能定位，着力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在科创、金融、消费等领域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城市活力。

## 毛艳华（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两大区域强强联手意义深远。比如，在产业协同方面，大湾区的产业分工协作水平高，产业集群较为发达，充分发挥大湾区内地9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优势，深化跨地域的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协同发展格局，不仅有利于攻克“卡脖子”的产业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而且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国内许多链主企业都集聚在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要让两者强强联合，发挥更大作用，关键是要更好地推动两地的市场一体化，最重要的前提，则是让两地的创新要素流动起来，鼓励和支持两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广泛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同时，两者也要加强国际人才服务体系的共建，加强国家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的共建等，共同承担国家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独一无二的创新优势，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创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大湾区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很高，“深圳—香港—广州”创新走廊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二位。长三角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有着自身的优势，比如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与创新资源的共建共享，等等。两者可以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方面开展共同探索，开展科研机构之间跨区域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核心技术创新的攻关等，让两者创新资源强强联合。

**徐天舒（江苏长江产经院苏州研究中心，苏州科技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尽管是个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议题，但当它们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就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考量。具体拿区域内的标杆城市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定位为打造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长三角的杭州的目标是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再拿两个区域的产业特色来讲，珠三角辐射港澳，相比长三角产业链更为完整（但苏州的配套供应环境一直落后于深圳），创新活力更为强大。而长三角嵌入全球产业链更为深入，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更有优势。因此，长三角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初期阶段，还是要立足区域自身战略目标、资源禀赋和特色，先将本区域一体化建设工作做好做优；其次，两区域加强交流，共享发展经验，力戒产业同质发展或招商恶性竞争；此外，两个区域的标杆要放眼全球，统一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长江中上游各省市热切期盼长三角和粤港澳两个龙头加强合作。从空间区位看，长江中上游区域是连接两个龙头的纽带，长三角和粤港澳“双龙合作”是中上游省市发展的重大利好。过去 10 多年，广东已通过泛珠三角合作机制，与滇黔川赣湘等长江中上游省区深化了产业和经贸联系。长三角与中上游省市的合作也有长江经济带这一战略布局。接下来，就看两个龙头的链主或潜在链主能否链接区域伙伴，各省市链长能否真正促进链式合作，由此实现“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发展动力格局。老家在四川，希望两个龙头能深化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合作，带动成渝一起腾飞。

**踪家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首先，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既有东部最发达的区域，也有东部的塌陷区，长三角的

“塌陷区”是苏鲁豫皖交界处，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粤东闽西地区。现在到了亟需促进东部“塌陷区”振兴的时候了！其次，上述两大“塌陷区”的振兴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解决的东中西协调发展，而“塌陷区”振兴解决的是东部的内部协调发展问题；第三，建议实施虚拟省会战略，在不变动省会的条件下，将徐州和“汕尾—揭阳—潮汕”作为江苏和广东的虚拟省会，举全省之力给予支持，具体举措是将徐州升格为副省级城市，“汕揭潮”赋予副省级权限。

### **阳旸（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级战略，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在发展各自突出性优势产业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产业对接、信息交流与政策协同，借助长三角的人力、智力、大市场、强产业基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国际市场优势，以产业“链主”为牵引，协同对产业链缺失、薄弱环节及时进行补链强链，打破地理约束、优化产业链布局，实现产业多元化与产业专业化的良性集聚，使产业链能够以最经济和最有效率的方式运行，带动两大国家级战略区域高质量发展。

### **李新颜（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首先，两地各有优势，互补性强。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从各自历史条件及资源禀赋出发，形成了当下的产业集群，奠定了各自的基础性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在借助港澳窗口，对接国际需求，以“三来一补”等形式导入国际产业链，以加工型外贸及电子通讯等产业为先导，并率先推进产业链升级，走在前列；长三角则借助人文及人才积淀，引入新技术，推进本土化产业发展，特别是抓住了新能源、生物技术的机遇期，在太阳能光伏、风电，物联网及集成电路、医药外包服务及创新药等领域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

其次，当前双循环模式下，更加突出精耕细作，两地在形成各自优势的基础上，仍面临着产业升级高度化不够，产业链安全性需要加强，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及短板亟待弥补等问题，需要不断深化合作，在精耕细作中加强和完善这些优势产业，合力营造全国一盘棋的局面。

第三，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应建立和强化长效化沟通机制，这一点国家层面上可以多做些引导和布局。两地要在产业链上充分合作交流，避免重复建设，特别是在集成电路、生物技术等长周期高投入产业上避免高水平重复。

### **邵斌（苏州科技大学）：**

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从传媒行业的数据新闻角度做些比较，让传媒业成为两地产经联动的纽带和桥梁。这有助于解决当前网络复杂多变环境下，突破信息监管的困境，发挥传媒力量，协助政府推动传统新闻内容向数据新闻方向转变。建议建立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数

据新闻联动共享机制，共享《网易有数》《界面数据》等媒体的用户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数据新闻挖掘能力，在复杂的多维数据中找到亮点，加紧推进数据新闻共享。政府可激励与监管同步，以数据新闻为趋势的传媒内容生产机制必然会促进优质的新闻内容生产，尤其是数据新闻的可视化、交互化等诸多优点，必然为网络信息的传输与流动带来保障，并且符合人们阅读需求规律的可视化呈现也会有助于激励传媒行业的发展，让传媒行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数据新闻，如珠三角的新媒体民营企业的《网易美数课》和长三角的传统国企文汇报集团的《界面大数据》，这两个区域和北京的财新杂志的《数据可视化新闻》可以做一个对比。从全国的角度看一些社会经济大数据和从珠三角、长三角区域看，大数据的数据新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黄建康（江南大学商学院）：**

在自主创新方面，需着力引导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基于企业层面的技术研发合作。区域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高资本积累率的过程，而是一个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与工艺创新的过程，因此区域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企业技术能力的成长。通过两地合作，优势互补互用，逐步形成国家战略性引导，两地企业互动学习和自主创新，实现两地经济共赢发展的良性局面。

**朱菊萍（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

在营商环境上，粤港澳和长三角都在全国具有引领性，面对 CPTPP 和 RECP 的落实更胜一筹，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粤港澳地区值得推崇的经验是，政府通过税收、销售等关键指标掌握企业发展状况，一旦发现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下降，主动推送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两地之间民营企业的合作。两地的民营经济都非常发达，也是推进合作的最有力微观市场主体，民营企业之间在技术合作、产业合作、项目合作、市场合作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是两地合作高质量落地的基础（可以轮流坐庄举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二是推进两地之间的营商环境的合作。如果说企业的合作是两地合作的基础，则两地营商环境的合作则是推进的催化剂。营商环境的合作的主体在政府。当前，两地的营商环境水平在全国都处于前列，但这些营商环境主要是服务区域市场主体，而对于如何有效进行跨区域对接，则需要两地政府进一步突破固有思维和利益藩篱，着重从体制机制角度加强创新，让企业在跨区域合作中感受到高质量一体化的营商环境

境。三是注重打造一批精品示范对接工程。如两地共建一批高质量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服务平台，共同推动一批有重大安全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产业链合作工程，共同打造一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创新企业集群，共同推出一批降成本的实际举措等，以点的突破带动两地合作的面上突破。

#### **赵春艳（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作为我国两大战略极点，在尊重区域发展活力的竞争需要前提下，应积极探索创新引领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方面所蕴含的互补空间。站在江苏角度，要由关注“自强”转向“自强”与“共强”兼顾，这就需要“培好基”“育好苗”“施好肥”：

一是“培好基”，要围绕细分产业领域，构建“新特色”产业链布局，既要以竞争为主，体现支柱实力的“新”特色主导链和体现前沿创新的“新”特色培育链；也应通过创新跨区域财税共享机制，布局协同发展为主的“新”特色协同链。

二是“育好苗”，要围绕品牌价值塑造，推动“江苏精品”品牌培育精细化，推进“双精品”战略，即体现涵盖本土优质大企业的“江苏特色精品”和体现行业表现突出的“专精特新”群体的“江苏协同精品”，提升整体品牌辨识度，从而为“新特色”产业链布局塑造精细化品牌培育体系。

三是“施好肥”，要围绕市场要素的有效、高效流通，推动与粤港澳大湾区间基于高水平的高校院所、人才、平台、机构、企业间的资信互认机制城市试点，探索促成对“新特色”产业链布局的优质要素精准供给生态。

通过“培好基”“育好苗”“施好肥”的“三链、双品、一生态”战略，推动江苏深度融入长三角，以及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高质量发展。

#### **宋凌炎（江苏精诚纺织有限公司）：**

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全国先进地区、发达地区，有着相同的领先之处就是都有互联网大企业。我观察两者区别在于，长三角更善于发现新东西，但落地不如粤港澳大湾区快。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是更敏锐、更敏捷、实践更容易落地，这可能源于粤港澳大湾区有一种“企业家精神”的拼劲。我们曾经有几个商会做跨境电商，同时起步，半年后线下会晤一次，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同行超越长三角地区一倍或两倍的效率。期待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能有更多交流互动，碰撞出思想火花、互动协同的联动联盟。

#### **顿文聪（湖州市区域合作办）：**

两大区域可以在营商环境领域加强深度合作。一是避免两大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陷入恶性竞争，互相挤压要素资源；二是两大区域可以携手在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方面为

全国作表率，作为营商环境最好的两大区域，可以积极整合制度资源、政策资源，拿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营商环境案例；三是加强两大区域间中间组织的联络，尤其是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组织，可以就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资源互补等方面多下功夫。

**曹荣庆（浙江师范大学）：**

区域间合作，要防止过于依赖政府力量。我国省级行政管理体系经济运行高效率，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特别是高铁高速体系的畅通，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但是，这两个方面涉及到中央层级的宏观管理体系，下沉到省级政府以下，特别是县市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典型，巨大投入，地域之间互相设置屏障，至而经济要素单纯空间位移，经济产出低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介入，而且在事实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介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并且在总体上降低了整体的经济运行效率。因此，在目前这种行政化取向日益强化的背景下，科学严格地界定政府“看得见的手”清单，特别是其运行的负面清单，是我国各区域互相对话、互动联动合作的重要前提。若在此方面有所建构，必将事半功倍。

# 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战略的影响 和我国的应对

2022年3月29日

**编者按：**继2021年6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建立供应链弹性、振兴美国制造、促进广泛增长》的评估报告后，2022年2月24日，美国白宫又宣布了10项新措施，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应对气候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确保中国或其他国家不能把供应链当作武器来对付美国。本次圆桌讨论会主要聚焦三个问题：（1）拜登政府意欲打造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升级版”的特征；（2）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3）如何应对美国上述战略？

**包卿（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中心）：**

近年来，美国拜登政府通过的相关供应链法案，进一步增强了供应链治理的国家政策干预、意识形态化以及地区与国家安全议题。一方面，美国推进制造业回归的过程中，着力塑造部分产业供应链的“内循环”和“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此次“俄乌战争”进一步强化与欧盟和日韩的合作联盟，推动新一轮供应链的盟国化。因此，当前顺应全球供应链的新趋势新特点，一是抢抓技术革新机遇，让供应链连接更具便捷性、跨界穿透性和数字智能化，二是推动多边规则的制定，积极响应多方面的关切，推动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治理。

供应链的规模尺度，可以比喻为电梯式的“多层次性”，电梯进入不同楼层的规模尺度中，会面对不同的治理规则，犹如到达不同楼层需要不同的“电梯卡”。多边规则协定，意味着多层“通卡”的存在。国家供应链的规模尺度越大，越有利于形成现代化的产业分工、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融入、参与和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治理”，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路径，是建立包容性经济社会体制的必然选择。因此，不论风云变幻，坚持推动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和高标准竞争性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立起“双循环”互动促进的新格局。

**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多变和严峻。一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美国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崛起和科技创新赶超，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冲击严峻。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需求

端与供给端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再布局。三是随着美国拜登总统自搞“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放大了主要国家之间信任缺失，正在撕裂和重塑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四是乌克兰战争地缘政治冲突更是加剧了主要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这些对于制造业大国中国来说，一个被撕裂分割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非常不利的。

疫情冲击下国际经贸合作变得复杂，触发了主要经济体对于供应链安全的担忧。让链“回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自搞自己独立的产业链、供应链更是成本高昂、变得近乎不可能。但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叠加新冠疫情下生产链、供应链不畅，以及乌克兰地缘政治冲突等，使得我国亟待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为此，对标国际一流营商规则，借鉴市场化、一体化和国际化的通行规则和做法，通过积极落实 RCEP、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积极申请加入 CPTPP 等渠道与双边、区域和多边国家和地区一起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本次美国报告的施行会显著提高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在全球经济深度关联的背景下，各国的产业链安全都是相对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美国报告尽管是着眼于其自身安全的，但相互依赖关系的削弱会增加贸易伙伴的风险。

我国的对策应该基于 RCEP 展开。从全球价值链收缩趋势和苏伊士运河货轮搁浅事件之中都能看到，地理距离仍然是供应链风险的来源之一，因而应将周边化作为风险应对的一个重要思路。RCEP 为我国周边化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区内国家不仅与我国有密切的经贸联系，而且在产业结构上有较强的互补性，可以为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广泛的支持。在周边化这一思路进一步的探索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等。

### **徐天舒（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中心）：**

三月上旬一美国议员直露声称：“不管以什么样合理的理由，超越美国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个人认为，美国阻挠中国和平崛起，可能已上升成为中美争议中最不易调和的问题。但中美贸易巨大的体量，又成为美国实施上述阻挠战略的巨大障碍，因此拜登政府正逐步不惜牺牲两国经贸利益这块“压舱石”，以建立新供应链这一最为直接的方式在中美经贸领域进行脱钩。

中美两国现存经贸领域的合作覆盖面广量大，尽管一旦供应链战开打，双方都可能会“杀敌一百，自损五十”，但从总体而言，我国产业化水平、供应链自主化水平不高，国际供应链的脱钩会对我国一直坚持的改革开放战略造成重大影响，因此还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应对这一可能的变化。具体来说：（1）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进程，梳理各关键产业链，强化供应链短板的解决预案，加快战略新兴产业、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国产化率；（2）深耕既有



中美合作的产业领域，做好对已在华投资的美资企业的服务工作，进一步开放市场，拓展新的合作领域；（3）针对全球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加快东北亚、东南亚自贸区建设和合作；（4）深化与欧盟的合作，少争论，多拓展经贸合作领域。我认为，经济这块压舱石对中欧经贸关系依然有效。

### **陈雯（厦门大学）：**

半导体产业是芯片制造的根基，芯片是信息时代的基础。美国政府报告提出加大政府采购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强盟友伙伴合作、建立人才通道等7项措施扩大和确保其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各个国家与企业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成果，我国的应对策略也应当基于长远的合作的发展，主要包括：（1）行业内部企业的联动。例如，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数目达到几千家，存在同质无序竞争的问题，需要做一些宏观调控整合企业，提升行业效率。（2）国家间的联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应积极深化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局面。（3）产学研的联动。一方面，华人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我国应建立多元化人才通道培育和引进优秀人才，并防止人才流失，同时也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鼓励创新；另一方面，高校的教育通常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加强产学研的互动交流是促进知识传递的重要方式。

### **方勇（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美国最近发布的建立供应链弹性报告，与去年发布的加强与美国进行技术竞争的一系列法案，都反映出美国为了在中美竞争中占据支配地位，不惜牺牲全球化秩序，不惜牺牲两国经贸利益，也不惜粉碎高效稳定的全球供应链。供应链弹性报告中隐藏的核心思想是，美国因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买方角色，对供应链的统治力受到了各个环节中关键卖方的制约。因此，从短期来说，美国必须增加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中的卖方数量，从而降低各个环节中卖方的市场势力，特别是支配性卖方和中国卖方的市场势力。从长期来说，美国希望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关键环节的卖方，进一步统治供应链。从这个意义上，供应链弹性报告反映出，美国需要的并不是由其拥有的全球供应链，而是一个受到它全面支配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高效稳定事关全球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分裂或者二轨运行将极大地损害中国利益，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统一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应该在全球供应链中充当黏合剂。中国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购买者，成为驱动供应链的需求动力源。中国更应该扮演好供应链中的卖方角色，尽一切可能呵护制造业的每一个参与者，让世界相信在任何不可抗力下中国都可以稳定、持续地向世界供给。

**赵伟（浙江大学）：**

美国拜登政府的产业链供应链政策调整，其影响可以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段构成的时间序列去看。

短期即 1-2 年内，是供应链重构冲击。受冲击的着力点在企业层面。疫情发生前，美国政府华为等中国科技型企业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限供，已经导致许多企业关注供应链安全。疫情突然暴发加剧了这个势头，美日欧等国在华企业开始筹划将敏感技术生产环节迁出我国。由于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冲击复工复产，延迟了这个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还在进行，估计未来两年还将持续。值得注意的是，供应链重构已经威胁到我国某些行业的扩展，最值得关注的是号称万亿产业的 C919 大飞机制造。按照早几年公布的该飞机制造蓝图，许多关键部件要么美国企业提供，要么美欧合资企业提供。可以预料的是，目前要上马批量制造这种大飞机，供应链安全系第一大忧患。

中期内即 3-5 年，是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冲击的落点在产业层面，通过国际贸易施加影响。最大的影响是中国作为东亚价值链轴心地位面临威胁。此次疫情暴发前，经过加入 WTO 之后近 20 年的持续开放，我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三大轴心之一，其他两大轴心分别为美国和德国。其中美国作为北美价值链轴心，德国作为欧洲价值链轴心，中国作为东亚价值链轴心。所谓轴心就是制造业产业链的枢纽，所有零部件汇聚该地总装成最终产品再分销世界各地。东亚价值链在国际贸易层面有两个重要支柱，分别为美国和欧盟，二者分别占我国外贸的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中美分道扬镳，供应链重构，中期内引出的问题多半是中国作为东亚轴心地位的变局，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

长期内即 5-10 年，是全球化分群。20 世纪 90 年代掀起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出的，基于 2 ~ 4G 互联网技术的突破。目前信息技术正进入 5G 和 AI 时代，随着这方面技术的迅速变革和应用，全球互联网分群势在必行。这方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5G 是万物互联的网络，这个网络最大的挑战是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各国将把防范安全风险置于首要地位。不难预料，中长期内，我国对外开放将遭遇越来越强的迎头风，外贸、外资、境外上市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国际技术合作将趋于困难。

**谢锐（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针对拜登的供应链新政策，中国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应对策略。第一，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合作，培育多元化全球供应链网络；不断深化与欧盟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拓宽中欧经贸合作领域，降低供应链合作壁垒。第二，稳住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面。以中美元首“云会晤”为契机，挖掘中美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信息通信

技术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增加供应链合作机会。第三，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加快供应链的固链、补链、强链和延链工作，并形成必要的产业链备份系统，加强供应链自主可控性。第四，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优化基础研究的设施和环境，攻克供应链“卡脖子”环节；支持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全球基础研究协同发展，促进中国及全球供应链的转型升级。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近期调研发现：一是小企业面临的卡脖子风险比中型以上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大。说明小微企业更加依靠外来的技术，因而也更感受到风险；二是供应链受到的冲击较大。无论是面对上游供应商，还是下游客户，企业反映受到冲击均较大，且下游面临的冲击比上游更大。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的供应链生态，仍然受到“两头在外”的制约，特别是国内消费力度较疲弱，消费仍然要靠外部市场。

针对上述困难建议：一是要把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工程提升到更高战略层面。在既有的各类政策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培育的支持力度。这一培育工程需要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化支持，放手让中小企业来创新发展，政府做好精准服务；二是要加大对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当前，国际环境风云诡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深层次推进。在重大风险预期和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很难有长远的投资发展计划，容易出现发展战略短期化、投机化。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各种政策需要对冲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稳定企业家的风险预期。避免对待企业和企业家的态度出现波峰波谷，让企业家难以适从，最后选择以“躺平”来应对。

**杨宏翔（绍兴市委党校）：**

根据调研，结合拜登的供应链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点需要重视：一是调研了解到本地企业，尤其传统产业领域的绝大部分企业，近两年生产和利润也很好。企业家讲主要原因是我国疫情控制好带来的。企业家普遍担心，疫情过后，产业结构相似的相关国家制造业恢复正常，美国实行弹性供应链战略会对一些中小企业造成较大影响。二是调研了解到本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融入国际价值链比较深，欧美是主要出口地，美国弹性供应链政策会对这些企业影响较大，企业家讲，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但美国还未闭关，如果闭关对他们企业就是致命的。三是调研了解到部分关键原材料依赖进口，相关企业中原材料依赖进口度达到20%—50%左右。依赖进口的原材料类型主要为集成电路、芯片、晶片等电子元器件，先进生物、化学材料，先进钢铁、有色金属等新型材料，计算机及信息化终端设备等工业互联网设备等。调研了解到关键设备或零部件国产替代率不高，国外供货渠道多处于垄断状

态，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应用率不高，部分应用软件受制于人。

**魏建（山东大学）：**

建议：第一，国家确定哪些为关键产业链，要求各个相关部委分工进行监测，并指定某特定机构汇总监测信息，定期报告。第二，对每一战略性产业链每一个环节进行“核心、紧密、弹性”分析。要求核心环节必须能自我掌控（如果当前不能掌控，制定出计划蓝图）；对于紧密环节，则必须有足够的影响力，确保供应；对于弹性环节可进行多个备份。第三，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理念，通过培训青少年、投资民生项目等等措施，推动强化与紧密、弹性环节所在国家的关系。第四，强化“循环利用”，提高产业链资源利用效率。中国是消费大国、制造大国，终端产品和制造环节的“废物”产出都众多，废旧电子产品、固体废物、废气废水等的回收利用，不仅能大大减少污染，还能提高产业链的资源自足水平。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我的主要观点是“积极主动应对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首先，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具有战略性、持续性和聚焦性等特点。其次，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影响深远并已经显现。从时间上看，短期影响已经显现，对我国供应链以及进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长期影响更大，同时伴有诸多不确定性。从范围上看，不仅在制造业、科技领域，而且在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领域，如产业政策、能源、金融、人才、教育、网络、外交、人权、国防等诸多领域，美国都将遏制围堵中国。从趋势上看，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从总趋势来说不可逆，但也有可能在某些特殊阶段出于特殊利益的需要暂时缓和一下实施力度，因此也会出现反反复复的特点。再次，战略与策略并重，积极应对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建议在战略层面，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和双循环战略不动摇。要尽快制定针对美国竞争新政策的科技创新及产业链安全计划，把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供应链关键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建立产业备份系统，全力打造韧性供给体系。在策略层面，实行“粘性策略”“突围策略”。前者就是与美国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不主动寻求与美国科技及产业的脱钩；后者就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与美国积极争夺 RCEP 国家及欧盟的支持，逐步建立以我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张得煜（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以半导体为例，美国报告认为美国半导体产业占全球半导体营收的近一半，但美国本土半导体生产能力所占的份额已从 20 年前的 37% 下降至约 12%，可使用的材料、工具和设备来源有限且高度依赖国外，特别是在亚洲地区，这将造成供应链风险。此外，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流行期间，美国出现了部分半导体的短缺问题，这也表明半导体这类重要产品确保

稳定、有弹性的供应链的重要性。该报告指出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将会逐渐摆脱对国外的依赖，重新调整产业布局；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大幅增加资本投入，建立弹性供应链；提供特殊政策，留住人才，确保全产业链的自主性和技术优势。美国的这一政策使我们认识到，半导体这类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重要产品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级化、现代化进程，梳理各关键产业链，制定产业链补链、强链的落实方案，确保重要产品、重要组件和部件的国产化；重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方面重点引导和扶持，支持企业在其细分领域深耕细作，成为“隐形冠军”；同时，我国应加大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度，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和优惠政策让优秀人才，特别是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业，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 为什么说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新计划经济？

2022年4月13日

**编者按：**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但也有一些社会误读，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搞新计划经济。为此，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们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并对如何做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建议。

## 白明（商务部研究院）：

之所以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仅要用好国内市场，更要建设好国内市场，让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更加能够发挥关键性作用。事实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政府的有为并不意味着越俎代庖，而是为市场主体搭建更高水平的资源优化配置平台，由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政府的有为体现在两个方面，既不缺位，也不能越位。

建议：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也要坚持有破有立，不仅要建设有规矩、高效率的市场体系，也要破除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打破行业垄断与区域割裂，用大循环替代小循环。至于这个《意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覆盖能力，我也感到特别全面，不仅从上游涉及到人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资源优化配置，而且也从下游入手，推动商品与服务的流通体系建设发展与提升水平。为此，需要为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而推进统一规则建设。至于《意见》所说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并不认为仅仅针对的是内循环，而且也是着眼于夯实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条件。事实上，国内市场恰恰是全球市场的中国分场，在国内市场同样可为国内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创造条件，只不过这是在我们的“主场”与国外企业竞争。如今，我们建设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要关门建设市场，恰恰是为了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开越好。这样的统一大市场，同样需要国内企业显示出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因而，我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国内的企业也需要同步适应这个统一大市场，成为合格的统一大市场主体。

## 孙志高（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

计划经济是指令性经济，强调政府主导，突出政府有为，经济活力不足。而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情，坚持市场功能和政府职能双重发力，在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指导调控效能，致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需要重点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要强化市场基础规则制度统一。完善统一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信用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监管执法公平统一。加强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打击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和保护市场活力。

### **顿文聪（湖州市区域合作办）：**

解读：（1）国家战略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2）区域发展需要，突破行政壁垒和过度竞争，实现充分的一体化发展；（3）地方发展需要，面对区域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地方政府疲于拼抢要素资源，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为地方发展带来轻姿态、大机遇。

建议：（1）在顶层设计上，坚持党的领导，以市场化为主，行政推进为辅；（2）在主要战略上，坚持全国共性与区域个性相结合，坚持国家底线与地方高线相结合，坚持破除行政壁垒与鼓励竞合发展相结合，坚持分类分级、试点推进；（3）在推进路径上，一是筑牢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的规则体系、监管体系、执法体系等底线规则，鼓励区域和地方依据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高标准区域政策；二是强化制度执行，改进地方考核机制，清除阻碍统一大市场的地方保护等机制体制，以市场化、法制化、协同化为考核重点，重塑考核体系；三是凝聚多方合力，千方百计避免政府一家用力，形成体制内耗和空转，充分依托多元市场主体共建共享统一大市场。

###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第一，中央出台的这个文件中，“计划”一词一次都没有出现，而“市场”一词却出现了119次之多。第二，中央出台的这个文件是出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考量，而不是针对疫情防控所出现的临时性地区管控问题的。有些学者将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短期内必要的疫情防控措施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为什么有人会产生“搞新计划经济”的联想呢？社会舆情对中央文件屡屡误读值得我们深思。当务之急是要针对当前社会上的一些误解误读误判，及时组织宣传阐释，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正确决策上来。

### **雷家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目的是为了拉平各地经济市场化进程及程度的差异。

建议：切实建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搞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的拆除不合理的市场藩篱，打破不合理的市场壁垒，这些藩篱和壁垒多多少少留有计划经济的影子，所以统一大市场建设：首先是进一步消除计划经济对市场交换的不利因素；其次，搞统一大市场目的是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市场信息的充分性和信号的明确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社会福利。在此之中也许会用到信息化和智能化工具来支撑市场主体的决策，但本质上都是通为了提高市场交换效率；第三，搞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进一步深化和必然结果，也是未来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展的基础。

建议：（1）统一大市场意味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市场，而不是割裂的市场，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利用新技术消除市场信号的扭曲现象，从而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决策；（2）国家经济政策对所有市场主体要公平公正，除极少数领域外，要尊重市场主体经营决策的自主权，减少不符合依法治国国策的对企业经营过程的粗暴干预和对经营成果的粗暴侵占；（3）在企业层面，要确立适应统一大市场的“大市场经营战略观”，也就是要将“非市场因素”也导入市场经营决策视野，来制定市场战略之外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法律战略、媒体战略和政商关系战略等。

**霍伟东（辽宁大学）：**

我们要搞清楚，计划经济的核心是什么。所谓计划经济，其核心是政府对资源的分配，包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政府行政命令决定。计划经济的明显特征是国家垄断和市场壁垒条块分割。

什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具有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高标准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高水平统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着力强化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规范市场干预行为的大市场。因此，我们从其各自内涵看到计划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不相容的。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是不是所谓的新计划经济的特征呢？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发展，计划性更有科学依据，更加精准，放管服更易实现，政府服务职能更易发挥。所以，搞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而与所谓的新计划经济风马牛不相及。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打破市场主体“成分”论，真正做到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力



行简政之道，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推动制度型开放。

**胡奇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市场（底层个体与企业的自发性行为）有其局限性，计划（政府的行为）也有其局限性，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但在更多的层面是互补的（在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要作用的前提下）。

广义的市场，包括底层的市场行为与上层的计划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说市场的基础性要素应该是全国统一的，这能增强底层市场主体的活力。这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那样的单纯的排除市场行为的计划经济。

建议：促进供应链的建设，需要促进供应链五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商务流。文件第三条款中提出了物流、信息流，但没涉及另外三流。建议加强供应链平台的供应链金融功能；增强供应链企业（平台）与地方政府沟通的机制，让供应链更加畅通，以避免如当前疫情期间供应链严重中断这样的事情发生。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统一大市场 and 计划经济有着根本不同。计划经济是靠行政指令对资源进行统筹配置，本质上是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而建立统一大市场则是通过消除阻碍市场机制发挥的各种因素，营造更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氛围，让市场“看不见的手”更好发挥作用，更优配置资源。

关于做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以下建议：1.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行政区属性，首先应当加强对各级行政区领导干部的培训，统一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把工作建立在深刻理解统一大市场的意义和内涵上；2. 加强中央的顶层设计，对各种基础制度、市场标准、竞争规则在全国层面统筹安排，尤其要加强有关方面问题的立法，这是最重要的整体性制度安排；3. 制定负面清单，梳理目前存在的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规则和做法明确列举出来，并向全国发布；4. 在国家层面成立协调机制，处理在推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和问题。

**高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作为自上而下单一反馈的资源配置机制，导致信息失真，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不具备自主投资、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职权。这种僵化的体制，决定了计划经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健全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上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通堵点、消除痛点，形成双向或多元反馈渠道，进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建议：（1）坚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促进市场更加竞争有序。（2）加强全国统一大

市场与区域市场的融合发展。（3）推进数字经济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提升市场效率。

**于晓华（德国哥廷根大学）：**

市场整合是发挥规模效应，促进创新的一个充分条件。过度的地方保护主义和细碎化的市场阻碍了我国大规模市场经济体效应的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是要基于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在我国和前苏联等国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这也提示我们，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注重“市场”机制的建立，而加强“统一”的部分是需要依靠法治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目的就是要去除因各个地方的行政管理的分工而带来的市场割据局面，达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各地企业走出狭隘的地域限制，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平竞争的活动平台。

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不仅是为了畅通全国范围的内部经济循环，更是通过一个公平竞争体制下的市场竞争的历练，使国内企业真正获得并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促进他们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进入国际大循环，在大循环的良性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成功。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要规范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二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对于经济的职能。规范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首先是要以法律为准绳去加强对于各种结构性垄断的限制和管理。造成一种既能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之下维持企业创新的源动力，又能有效地遏制大资本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通过不正当手段打压中小企业、盘剥消费者。

转变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更进一步让各地政府依法做好对于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监督和服务，做到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一视同仁。尽量避免因本位主义造成的对于所属地区企业的各种政策性倾斜。对于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考核、也应避免容易造成本位主义而不利于统一市场建设的各种因素与指标。

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不仅需要确立起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相辅相成的机制，更需正确处理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关系。让他们通过公平竞争达成良性的相互促进。

推进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将是一项较为长期的工作，目前的主要矛盾恐怕在于政府的角色变换能否成功？在促成转变的过程中，政府既要有为更要无为，有为的力度要放在推进法治建设方面，无为的要求让政府减少对于市场行为主体的直接干预。但是，要求以无为的方式去推动实行全国范围的市场统一，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尤其是当经济增长面临低潮的阶段，无论中西方国家都会以推动公共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而公共投资这部分份额的增加，恰恰又是增加了政府对于市场直接作用的成分。

**踪家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有三点判断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也不应该搞新计划经济：（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最基础手段，已经是共识；（2）统一大市场，首先是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大市场，更谈不上分割；（3）搞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堵点，不是走计划经济。

建议：（1）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只有推动各地方的市场化才能建设统一的大市场，发挥市场主体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2）建设更加促进市场有效性和强效性的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可以通过无为手段达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3）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4）打通省市交界处的断头路，降低交通与物流成本，减少并适时取消高速公路通行费。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统一大市场建设，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则之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维护市场上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这也是保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最核心制度。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的最大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虽然在此之前，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各种不完美的地方，但不同所有制经济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竞争力大幅度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更是井喷式爆发。2012年到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中央出台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建设，其中重要一条原则就是平等对待市场主体，相信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逯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统一大市场，主要是进行全国性的市场建设。通过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去除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对竞争的扭曲。中央政府不仅不搞计划经济，反而会把市场竞争的主体更加让给各地企业，让企业进行充分竞争。

建议：由于涉及的改革内容较多，头绪较复杂，还是应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渐次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工作。

**段进军（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全国统一大市场事实上是通过改革政府职能，打破行政区划，让要素充分流动起来，特别

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个也是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也是进一步落实双循环战略的重要举措。建议首先在重要的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推广。

**史嵘（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根本区别，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探索。在新发展格局下，这既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也是推动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一方面，资源在更大市场范围内进行配置效率更高，这已是毋庸置疑的公理。另一方面，价值链攀升是产业升级的根本目的，统一市场建设有利于企业向中高端发展的同时形成特色产业集群，立足于国内市场巨大需求向国家价值链延伸，最终实现 GVC 与 NVC 的良性对接与主导。

建议：（1）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建设，从而提升总体消费需求水平并扩大市场规模；（2）推进要素统一市场建设，打破地方保护，消除阻碍资源合理流动的不利因素，形成公平竞争的资源配置环境。

**魏晓芳（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要打破壁垒，运用市场规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动态配置，并非计划经济的静态强制分配。前者的关键词是市场、动态、协调、配置、流动，后者则是计划、静态、分配、控制、规定。

重点工作：（1）开展顶层规划，制定实施步骤，合理安排建设时序，下好全国一盘棋；（2）夯实底层架构，统一制度规则，科学集成技术平台，实现数字化升级；（3）打破行业壁垒，加快互联互通，有效推进区域协同，落实统一大市场。

**姜能涛（苏州石湖智库）：**

中国已经具备了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体系，产能供给不是主要矛盾，本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在需求消费端，统一大市场中除了政府支出作为需求的重要一方以外，更多的是企业和大众消费者，如何能够培育好我国消费群体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条件，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高国民收入，通过税费等多种手段途径真正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这样才能够为我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和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蔡瑞林（常熟理工学院琴川智库）：**

重点工作：（1）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统一。弱化城市行政级别，除试点外取消特殊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步建成城市与农村统一的市场制度；（2）基础设施高标准对接联通。加强区域之间水、电、气、网络、道路、新型基础设施在规划设计中的协同。

**余亦民（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计划经济的主体是政府，核心是计划；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核心是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让企业在统一规则的市场环境中均衡发展良性竞争；计划经济既不需要统一市场，也不需要企业竞争。

建议：（1）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中，逐步取消针对“开发区、高新区、自贸区、保税区”，甚至“特区”的优惠政策，实行普惠制；（2）承认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性，建立全国均衡发展、协调互补的区域差异性政策，分别“能源区、生态区、产业区、消费区、文化遗产区”等，给予政策倾斜和经济补偿。（3）逐步取消针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市场准入。

**李新颜（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落脚点在市场，统一的是市场规则，以统一来消除阻碍市场的各种瓶颈、卡点及障碍，其目的是形成空间范围覆盖全国的市场，消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及地方区域份额。

建议：（1）必须牢固树立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观念，层层推进，落实到位；（2）切实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权益，通过排查及梳理各级地方性规章制度，纠正并完善各种地方性制度，统一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之中；（3）建立和完善各类区域性第三方服务组织及巡回经济法院等有效措施，动态地持续不间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政策真正落地不走样。

**许怀康（南京荟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已经形成以供需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引入外资和对外贸易，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市场经济模式相较计划经济，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发展经济。

建议：（1）制定政策仍然以需求为导向，尊重市场经济规律；（2）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3）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充分利用统一大市场的调度和调节功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

**钟昌标（宁波大学）：**

两者有本质区别。强大的政府能够为经济发展启动提供最初的动力，要依靠市场维持动力不衰竭；大国区域分块能激活竞争效率，但做强需要合作，而合作要有统一的市场。

重点工作：（1）市场规则的统一；（2）政府之间合作的利益机制构建；（3）法规的明确和可执行性。

**韩超（东北财经大学）：**

搞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是消除阻碍要素流动、阻碍影响要素优化配置的因素，其根本是通过打通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堵点，与搞计划经济的加强管控完全不是一回事。建议：加强相关法制建设，提高法制建设的成效。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从《意见》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了市场成长逻辑，可以说是“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绝不是也不应该理解为“搞新计划经济”。（1）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源动力是市场内生的。改革开放 40 多年，市场活动、市场范围、市场主体、市场观念、市场秩序等持续演化，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发展诉求和内驱动力。（2）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逻辑归宿是促进市场高质量发展。《意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六大建设任务，根本上是要更好地培育市场主体、规范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壁垒、激发市场活力。

建议：（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坚持国际视野，对标对表高水平区域和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包括各方对多边体制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诉求。（2）在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区域先行先试的同时，也应借鉴区域和多边体制中的差异化原则，给予后发地区差别待遇。（3）在国务院政务监督平台基础上，打造全覆盖的行政权力公共监督平台，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行全过程监督。（4）总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经验，建立健全央地、部门、协会共同参与的建设机制。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计划经济的本质差异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面，前者通过价格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后者借助于权力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由于计划经济违反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因此，即使有了新技术的加持，仍然逃不掉失败的宿命。

重新梳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安排。财政分权制度以及 GDP 锦标赛制度虽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当前已成为影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构建合理的新型关系。

建议：切忌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无差异市场混为一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无论是商品、要素、厂商和产业，都有可能向某一地区集聚，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格局并导致地区间存在差异。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要人为干扰和影响资源的配置，影响市场的培育和自我演变。

**王海平（21世纪经济研究院）：**

统一大市场的一个方面是限制政府导致的不统一，以政府财政支出的项目看，主要应该着重于保证市场竞争者的准入前提是一致的，防止把政府花钱的项目给予特定的市场主体。建议，凡是政府花钱的项目，要严格执行“类—款—项—目—科”的公开公正透明，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的消息要能在公开场合大范围释放。

**徐天舒（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背景是：无论是因为地缘政治导致的全球贸易环境恶化，还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以往依靠各地招商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遇到了较大的阻力。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要激发内需，打通供应的堵点，亟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我国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的模式，通过调动地方积极性，来发现和培育市场的亮点。但是中国加入WTO后20年，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壮大了的市场，事实上还存在许多分割的要素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统一的市场规则，例如各省不统一的负面清单、各地画地为牢的数字资源、各地“定制式”的招标准则……这就需要通过规范全国性的市场规则，来全面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最重要的是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有了这些规则，就可以让企业、让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从这个层面来说，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做减法，即统一全国市场规则后，地方各类“土”政策应该减少，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目标。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世界500强企业研究中心）：**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征程上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战略举措。其本质是更规范、更高质量、更公平的市场经济。

关于统一的资本市场，（1）关键要协同上海、深圳和北京等重要市场，更要体现出差异性和特色性；（2）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应当做好股份回购、分红派息、大宗减持的表率；（3）大力推进资本市场专业化监管改革，特别是去行政化改革，提升市场化的监管质量。

# 县域城镇化：何以高质量？

2022年5月17日

**编者按：**近日，中央发布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本次圆桌会主要聚焦“县域城镇化：何以高质量？”，对《意见》中的重要方面进行讨论。

**包卿（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研究中心）：**

分析欧美成功的城市，不乏大量的中小城市（100万以下，10-50万人口规模居多），一是这些中小城市多数分布于大都市圈、城市群范围内，二是中小城市依靠自身特色优势、文化魅力和地方性的集体行动、宜居环境赢得竞争优势。

我国其实也一直强调城市化方针要偏向中小城市和城镇，但在实践中由于资源配置的等级性序贯机制的存在，加以市场化经济下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包容度高，吸引了人口的集聚。现在看来，新型城镇化要与深度市场化和高度国际化三者构成螺旋互动结构关系。只有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才能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国别之间深度的分工协作，各个规模层级的城市才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各自特色优势。此次《意见》的发布和实施，我们感受到，今后重点是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协同发展，城市发展要改变按照行政层级配置资源的扭曲现象，让各类城市、城镇得到充分的发展机遇机会，推动内生性力量的发展。

深度市场化是市场的不断扩张与深化，形成高标准统一大市场与高水平制度性国际化开放，是市场秩序中法治化不断提升，是金融发挥杠杆与催化剂的作用下市场资源要素更能跨期跨空间交易与组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突出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的协同协调发展。县域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政府力“一股独大”，市场力与社会力活力不足。县域社会是《乡土中国》所描述的熟人社会，是亲缘、地缘、血缘纽带非常强的空间单元。县域城镇化具有的优点是社会主体的扎根性强、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地方性网络强、熟人社会的稳固性强，弱点是社会分工不发达，自给自足性强，流动性弱，现代服务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创新创业不活跃。因此，县域城镇化向上必须加强与大都市、现代化都市圈的连接，向下要培育利用好自身的城乡网络。



### 闫浩（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意见》提出要科学把握县城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并把县城的功能定位划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和人口流失县城等五个类型。

根据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江苏的13个省辖市都达到大城市的标准，而且江苏的县城都在长三角城市群和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范围内，属于“大城市周边县城”类型。其中，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等四个县级市本身就达到“大城市”标准，四市与宜兴GDP总量都已经超过2000亿元，张家港超3000亿元，昆山、江阴更是超过4000亿元、接近5000亿元大关，这5个县级市即便参与全国地级市排名也能够进入百强行列，昆山和江阴的GDP规模已经超过三个中西部的省（自治区）。

根据《意见》的要求，作为“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江苏40个县级行政区的县城（市区）及县域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大城市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制造业、物流业、公共服务资源）的疏解转移，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其县域全境将与中心城市共同组成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

事实上，江苏的县城及县域，尤其是苏南、苏中地区的县城及县域已经在承接产业转移、拉动区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赛迪百强县榜单》中江苏有25个县（市）入围，数量全国第一。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宜兴六市进入前十名，分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八名。由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1年工业百强县（市）发展报告》中，江苏有24个县（市）入围工业百强，与浙江并列第一。其中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宜兴五市进入前十名，分列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十，太仓列十五位。

江苏的大多数县域正在与上海、苏锡常、南京等核心城市形成“创新尖峰+产业高地”的耦合模式，成为与中心城市“创新尖峰”遥相呼应、协同发展的“产业高地”。未来在以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宜兴等头部县级市的带领下，在以丹阳、溧阳、泰兴、海安、如皋、启东、如东、靖江等第二方阵县（市）的支撑下，江苏县域经济将会在发挥卫星城市功能和创建世界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进程中再创辉煌。

### 郭进（上海社会科学院）：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消费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能否确保投资的持续增长，成为各地政府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财政和金融资源普遍存在向一线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其直接后果就是，各省市的省会城

市、中心节点城市的首位度不断提升，而广大的县城、非中心节点城市则普遍缺少财政和金融资本的关注，这也是近三十年来，众多县域人口持续外流、缺少核心产业和领军企业的重要原因。

当前，落实中央提出的县域城镇化战略，核心是要重新梳理各县城镇的功能定位，在已有的都市圈、城市群、节点城市的战略框架下，在顶层设计层面，重新研究各县城镇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分工、人口政策等城市总体规划；在制度层面，努力消除扭曲资源配置的特殊化政策；在市场竞争层面，让市场机制发挥、纠正和消除人为扭曲的过度大城市化现象。

### 张得煜（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从历史上晋商发展的视角看县域城镇化发展，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富有地域特色的商业文化。晋商信守“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盛”的道理。因而，晋商世代都很注重宅居建设。于是，晋商事业成功之后，并没有滞留在发达的大城市，而是选择了荣归故里，倾尽财力在家乡修建宅邸。这些深宅大院宜居、温馨、典雅，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文明的载体。院落的内部结构与设计体现着独特的商人文化，如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等已经成为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

晋商这种安土重迁的理念，既合理的构建了家族的精神家园，又在客观上发展了当地的县域经济，形成了“大城市生产，小县城生活”的模式，比较合理地安排了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其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智慧。

###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意见》对于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一线大都市城镇化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数量庞大的县城为主体的区域城镇化还有相当的增长空间。以县城为载体加速城镇化发展步伐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推动县城的城镇化，一是以“工业兴县，产业强县”作为发展突破口，大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县域经济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区域特色产业；二是坚持“以政策驱动项目，以项目带动投资，以投资培育龙头，以龙头孵化集群”的产业发展思路，通过产业振兴实现市民增收、地方增税，以产业大发展驱动城镇化大提升；三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以是否有利于产业发展为检验，避免过度采用政府举债方式进行大规模基建开发，更多借助市场力量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增强县域经济的循环造血功能，力争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 王海平（21世纪经济报道）：

从实践中看，尤其是从本人多年的跟踪调研看，因为人口增长有限，至少江苏的绝大多数县域的高质量人口一直持续外流，这从县域籍贯的每年大学生毕业动向可以看出，而且不少发达县域的公务员辞职数量至少在疫情前也年年创新高。过去县城城镇化是政策拉动的，如通过对乡镇高中发展的人为限制，到县城上学又需要买县城的房子，加以县城能提供较好的医疗等公共服务。因此，县城城镇化，重点应该在解决县域的环境问题。同时，要严格限制县城城区面积的摊大饼与熊板棒子寻找新增长区域的粗放式发展，因为县城面积的过度扩大，对基本农田保护造成较大冲击。

### 杨建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首先，中国县域城镇化差异特征显著，要分析是否具备城镇化发展条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县市是城市群、都市圈的组成部分，城镇化更具条件。中西部偏远的县，大多不具备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条件，如何创造条件走城镇化之路。如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第二，要在县域的城镇功能定位下功夫。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差异化的战略性、竞争力定位，发挥其最大效能。如大城市的“后花园”，或专注于建设农产品物流中心，或承接城市产业配套，特色产业集群地区。第三，找到县域城镇化的重点载体。如浙江特色小镇、经济发达镇的发展很热。当前，一些市与县层层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甚至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要建设特色小镇，结果揠苗助长、事与愿违。

总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凸显主导功能，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一地一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 郭金喜（浙江师范大学）：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都市圈和大城市群的兴起并没有改变“郡县治、天下安”的基本逻辑。作为基本的行政单元和空间单元，县（城）在空间均衡过程中均占一席之地。在着眼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发展阶段推进县域高质量城镇化，需要各地在综合考量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数字化改革与作用，更加突出融合发展下的差异化竞争战略，更加重视着眼于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供给。对相对落后的区域而言，县域城镇化可以通过更好地融入城市群和推进城镇的规模扩张创造发展契机，并通过优化财税体制强化“乡之首、城之尾”的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标准化和可及化。对包含长三角在内的发达地区而言，应通过高层级的综合改革，进一

步完善制度性、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区域产业专业化供给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的重心完成从物到人、从规模到结构、从面子到里子、从建设到治理等的转向。

**王锋（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中心）：**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关键要解决“人”的问题。既要“转得出去”，又要“留得下来”，还要“引得进来”。“转得出去”即引导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快速融入县城和中心镇。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做强产业支撑，要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着力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留得下来”即解决农村发展的动力问题，让农村有人建设、有人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县城对镇村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引得进来”即吸引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资金、人才、技术密集型企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县城，持续提升县城城镇化质量。

**赵建（西泽研究院）：**

城市、大城市与都市圈，是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平台载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集聚效应的服务业快速崛起，现代化大都市圈是全球化高歌猛进背景下的产物。当这一切发生变化，当城市尤其是超级大城市在疫情和变局中变得无比脆弱的时候，国家意志可能需要重新从乡土中国中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

从国家安全情形来看，超级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大城市，就像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旦这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全国内循环系统就遇到了阻梗。回想上世纪60年代的西南新三线建设，就会理解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城市化布局。也应该看到，西南地区之所以后来能涌现出众多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城，并非偶然，有历史积淀的功劳。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产业与供应链的“去中心化”分散布局，除了安全稳定的考虑外，还可以通过产业化带动新的城镇化，解决县域城镇在大城市化过程中被虹吸人口和资源的问题。然而，这里面有个规律需要在县域城镇化中对抗，那就是第三产业或现代服务业的崛起，本身是需要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县域城镇的产业化，比较优势是重工业、高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以及工业化的农业等。因此，这意味着部分重新向重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回归，然而地处乡镇的企业能否再度崛起，以形成县域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我们还需要观察。

#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和对策研究

2022年6月14日

**编者按：**近日美国召开了民主峰会，紧接着又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2022年5月20日开始，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和日本，还召开美日印澳四方会议，正式启动美国去年10月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所有这些会议的矛头指向中国。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院长组织有关学者召开圆桌会议，就以下三个问题开展研讨。

问题一，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是什么？

问题二，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问题三，我国应当如何应对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

以下是圆桌论坛的发言实录。

## 一、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太”是“扩大的亚太”，实质上是美国地缘战略思想的延伸，即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形成围堵中国的战略弧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主要目的在于落实美国的“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撑，就是想搞美国版的去中国化的经济全球化，在制造业、芯片、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等全面围堵中国，与中国脱钩。

**霍伟东（辽宁大学）：**

“印太经济框架”实质是筛选朋友圈，对不符合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伙伴进行筛选，主观希望造成了针对特定国家并与特定国家的硬脱钩。

**唐德森（北京大学）：**

“印太经济框架”将会是一个“超越 TPP/CPTPP 和 RCEP 的非传统贸易协定”。该框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补全“印太战略”的经贸短板，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印太经

济框架”（IPEF）的出发点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其实质是服务于美国的根本利益。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美国企图在印太地区以印度、日本等几个军事同盟或所谓民主制度国家为核心支撑的排他性经济圈组织。他们认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与西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相异的、挑战美国支配全球地位的国家。这个经济框架是美国设计的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服务于美国根本利益的，与其它一些“小型多边集团”一样，主要是为阻遏中国对美国的超越和中国全球影响力“定制”的“统一战线”怪物和心虚表现。

**缪锦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IPEF 主要包括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柱体系，与其他贸易体系相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从战术层面来看，在新经济等高精尖领域构筑一个封闭、对抗性的供应链体系，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链替代方，将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重中之重。但其实从理性的视角，具体到任何一个国家，在战略层面利用综合优势，出于巩固和确保自身地位的考虑，建立由本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组织，并不直接否定其他经济组织已达成的双边和多边协议，也不应过度解读，应持续聚焦后续美国商务部与贸易代表具体谈判结果的落地，并提前做好相应缓冲对策，制衡措施，应对挑战。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美国发起印太经济同盟本质上还是在构建“去中国化”的亚太供应链同盟。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投入的经济资源较为有限，所以必须依靠包括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一起强化对地区的影响力。目前看，美国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发挥日、韩等盟友在亚太地区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来整合地区供应链。通过亚太经济联盟，以美国和西方为大市场，由美、日、韩等跨国企业牵头重新布局全球供应链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全球供应链。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IPEF 的实质是美国为参与印太地区经济活动，深化与印太国家经济联系而建构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其深层意图则是增强对印太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简言之，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拼图。

**林学军（暨南大学）：**

所谓“印太经济框架”（IPEF）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它的根本目的是补全“印太战略”的经贸短板，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数字经济、供应链、绿色能源和反贪腐四个

关键领域建设排除中国的一体化联盟，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对抗。正如王毅部长所指出，“印太战略”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维护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冲击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

## 二、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的经济影响

### 霍伟东（辽宁大学）：

“印太经济框架”影响巨大。由于投资贸易的替代和外溢效应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可能由于硬脱钩导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减少，要防范中国开放战略可能的被动。

### 唐德森（北京大学）：

主要的影响是：第一，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和割裂；第二，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会被拆解，循环一定受阻，尤其国际循环的顺畅及效率可能受制于“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推进；第三，构建以我国为链主地位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以及供应链的格局，将会减缓或有断裂、脱钩的风险；第四，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与进一步繁荣将会受到较大影响；第五，对我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如东盟、中日、中韩等，将会出现变数或不稳定。

###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这个框架的出发点“去全球化”、“去中国化”，企图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剥离”和对中国市场依存度“摆脱”，框架试图以印度庞大人口、市场和美国、日本等技术相结合，形成对中国制造碾压之势，取中国而代之。因此，其影响必定是从制造、供应和市场对中国全面打压和削弱来实施的，会从投资、产品、企业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主要方面首先建卡设禁，堵住我国双循环之通道。

### 缪锦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必须接受这样长态趋势的事实，即美中竞争甚至部分脱钩将长期存在。无论美国两党谁执政，以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等霸权制衡中国，都是美国国家战略。本次“印太经济框架”不过是 TPP 的演变版，跟“重返亚太”变成“印太战略”一样，本质就是要围堵和遏制中国。与以往相比，13 个首批国家中，越南特别应引起重视。越南虽不是创新大国，但确实构成了对中国供应链转移的巨大挑战。此外，美韩“全球全面战略伙伴”的建立以及半导体制造大国马来西亚的加入，对中国芯片等高端产品、高端技术形成了围堵，势必影响中国产业的进一

步升级，并在中国东盟合作领域掀起波澜、制造混乱。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印太经济同盟对中国影响主要是过去几十年建立的东亚价值链体系面临重构，日韩在产业链布局上会更加倾向于越南和印度等同盟内国家，从目前趋势看，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有所体现。

目前美国目的主要可能还是数字产业链这块去中国化，这是这些年中国经济含量价值最高的一块，日韩企业是龙头，如果动员他们搬迁去越南和印度，整个数字产业链格局会重塑，亚太自由贸易区可能还是聚焦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这个亚太经济框架聚焦在数字与传统贸易方面，数字贸易权重可能更大。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其一，在印太国家构建替代或部分替代中国的供应链体系，从而抵消中国对美国及相关国家出口，加剧中国产能过剩或产业资本外流；其二，以美日韩为核心组建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形成对中国中高端产业关键零部件的供应链封锁。总之，如果该方案顺利推进，美国将实现其对华供应链高端封锁、中低端替代的战略目标；即便不能顺利推进，美国也可以借此干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节奏，使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

**任群罗（新疆财经大学）：**

“印太经济框架”意图减少对中国产品供应链的依赖。在影响方面，依据所查资料及自己的计算，如果中国被挤出世界主要经济体供应链，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 10% 左右，1978—2021 年数据，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 0.6917，边际税率是 0.1993，乘数大约是 2.24，考虑乘数效应后，实际会影响我国经济 22.4%，严重破坏我国产业链，对收入、就业的影响我国是难以承受的。

**王丰（江苏海美）：**

由于该框架不太可能包括有约束性的承诺。而且，由于拜登总统为保护美国就业不愿意对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提供关税优惠，亚洲国家和贸易专家对该倡议反应一般。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现在和将来，仍将对东南亚诸国充满了诱惑。在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以更开放的姿态，在 CPTPP 的框架内，大量进口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原料和农产品，来削弱美国对该地区不断加强的影响力。



**刘平（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IPEF 不是 organization，也不是 agreement，而是 framework，从它的定义看或许就是一种抽象或不确定的框架内容。尤其是，它排除了关税问题，所以至少目前看，对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来说，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关税问题被排除，很可能大大降低这些国家加入的意愿。

但这个 IPEF 至少不应该对 TPP 构成否定和冲击，很可能将来构成一种互补。由于美国内反对 TPP 声音很高，拜登政府又面临中期选举这个大考，此时回避加入 TPP 话题而重新建构 IPEF，是一个被迫选项但也是主动的战略和策略。不能完全排除中期选举对拜登政府有利结果后，逐步重返 TPP 的可能性，毕竟这是以日本为首 TPP 全体成员的希望。拜登祭出 TPEF，主要是对抗中国。中国现在正式提出加入 TPP，作为拜登政府的对抗手段，重返 TPP 是最好选择，也是回归奥巴马倡导建立 TPP 的路线。即使没有返回 TPP 可能，为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构建排除中国的印太地区经济协作体系，美国应该会推进 IPEF 与 TPP 的融合。

**林学军（暨南大学）：**

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就是从经济上构筑中国的包围圈，在印太地区打造经济“北约”。其主要作用首先是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其次，在科技上全面封锁中国，切断中国与世界的科技交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其三，利用盟国，排挤中国对外经贸，阻断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其四，以美国和西方的标准来确定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规则，掌握世界经济话语权、主动权。最后，利用“印太经济框架”，拉帮结派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施压。例如，打南海牌，美国拉拢北约盟友以及东南亚的盟友，在南海搞“航行与飞越自由”，制造矛盾，破坏中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合作。又如打台湾牌，拜登访问日韩后，美国又与台湾启动所谓迷你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台 21 世纪贸易倡议”。欧盟紧随美国，与台湾开展部长级经济对话，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恶化中国和平发展大环境。

### **三、我国应对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的策略**

**林学军（暨南大学）：**

第一，准确认知“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在斗争中寻求合作。第二，主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亚太经济共同体”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第三，加强国际组织活动，争夺印太经济话语权。第四，扩大中国朋友圈，冲破“印太经济框架”的包围。第五，加强科技创新，打破西方封锁。第六，提高我国的军事实力，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和正当的经济权益。

**曹波（法学交流基金会）：**

第一，建立区域联盟，联盟内承接西方市场，供应链转移目的地；第二，加大开放搞活，加大市场经济步伐，用比较优势破除针对性联盟；第三，加强合作，任何对抗只会成就对方。

**霍伟东（辽宁大学）：**

首先是做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东盟超过美国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国家对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不能把东盟推出去而应该是搂进来。

**唐德森（北京大学）：**

第一，从该框架的逻辑上看，更系统化地与我开展产业、技术与地缘经济竞争，我国被排除在外，与我们的态势更加明显，我国要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优势，来抵消其不良影响，同时，要以外交、经济、合作等方式，构建我们的影响力和独特优势；第二，我们要在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培育我们的国际产业链主地位及产业力控制力；第三，继续加大“中国制造 2025”战略推进，在核心领域，如装备制造业、精细仪器、大国重器方面创新提升；第四，要通过多边外交机制、贸易等方式化解该战略的不利影响；第五，创新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战略框架，扩大多边实质合作的基础，拆解该美国为主的战略谋划，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你搞你的“冷战”，我不跟你的节奏，坚持按照既定步骤并及时变法，推进我国主导的“新全球化”，因为印太不是美国，也等同不了美国，印太与我们有更多的利益交融，逆历史和各国利益而谋私，无视“各国经济更优发展”最大公约数而建立的集团组织，都长不了，都很快会内部离析瓦解，我们有充分信心，一是坚定落实“RCEP”和“金砖国家”合作及推进“一带一路”，这都是大于“印太经济框架”的区域性、全球性经济合作，以经贸汪洋大海化解小圈子恶浪。二是坚持开放，坚定推进与美国、印度和日本、韩国等印太经济框架核心成员国经济合作和经贸交往，促进印度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继续维护日本在我国设企和市场拓展，实现双赢和更深刻的经贸关系。三是坚定做强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更好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向印太经济框架国家发展，特别是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鼓励民营企业与印太经济框架中国家企业合作共赢。四是做强国内大市场，用国内大市场包容国际市场，形成与印太的更深经济血脉关系，印太经济框架日本韩国等主要工业国家，对我国经贸历年来均是顺差，他们会更为看好我国市场及溢出效应。五是鼓励我国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海外商会与印太经济框架所在国发展更好商会组织交往关系，用更经济的本质性削除美国意识形态偏执，做强我国企业与所在国的民间友好坚实基础。

**缪锦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应该面对现实，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在复杂环境下做好国内自己的事最为重要。第一，应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不能动摇，只有保持经济活力和一定的增长率，比如做到抗疫与经济平衡和边界控制等，才能缓解供应链外移，以此，推动中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向好。第二，在做好内循环以及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在亚洲范围，除继续推动与东盟的共同发展，进一步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对冲“印太经济框架”的围堵。第三，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重塑企业家精神，刺激市场活力，继续推动基础科技创新，通过持续努力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营造内生优势以及建立国际市场该有的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忽视与缺失的重要一环。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中国应该积极回应美国的印太经济同盟战略，尽管美国是去中国化，但是中国国内庞大的市场以及制造业的产能和配套体系应该是优势。印度和越南在产业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存在一定的代差，即使发生产业转移，作为东亚链主美日韩企业也无法完全剥离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因此，必须提升中国自身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对跨国资本的粘性。一是优化营商环境，二是依法治国，提升政府治理透明度和公信力；三是降低产业综合成本，四是提高产业发展效率。在产业发展综合能力聚力资源以有效对冲美国的产业链围堵和封锁。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就国际分工演进客观规律而言，美国有深化与印太国家在相关领域经贸合作的逻辑，中国也同样有深化区域内国家在相关领域经贸合作的逻辑，这两个逻辑并不必然冲突。对中国来说，还是应该一心一意建好统一大市场，办好主场全球化。对东盟而言，亚太自贸区和印太经济框架都不是坏事。

**王丰（江苏海美）：**

目前有必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和东南亚国家在友好互惠的基础上，继续降低贸易门槛，增加对东南亚各国的产品进出口。第二，在南海问题上，继续践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理念。在合作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双方受益，共同富裕。此次越南高铁项目落入日本企业之手，值得我们反思。第三，针对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由政府牵头，以 PPP 的方式，支持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缓解我们当下产能过剩的压力，同时打好中国建筑这张王牌，在该地区统一标准，对各国增强粘性。第四，利用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保障，在广西云南等和东南亚临近省份，大力设置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贸区等。吸引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外国企业前来投资设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的产业交集。

# 全球化的趋势与中国的方略

2022年6月29日

**编者按：**中美博弈、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叠加，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寻求重组供应链，美国积极推动印太战略，全球化发展呈现新趋向和新势头，尤其“去中国化”进一步成为现实的压力和挑战。本期讨论聚焦两个方面的探讨：（1）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2）中国应对新全球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目前政经界关于经济全球化前景，大体上有三种判断：终结论、停止论或延缓论、分岔论或分群论。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会停止，更不会终结，但会出现新旧全球化的分叉以及分群化深度发展趋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就中国国民福利与国家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的目标来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变局，当着力于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取适当的方略。

第一个是多边层面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取顺应与积极参与改革的策略。情理上说，中国是疫前世界经济多边治理体系的最大获益者，积极维护现有世界经济治理多边体系当义不容辞。但必须看到，此次疫情极大地冲击了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孕育着多种变革的因素，疫后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特朗普以及拜登政府发起的“去中国化”冲击效应不可低估。故而明智的策略当是维护与顺应改革并举，以顺应获得参与，在参与中去维护。重心当以维护并参与现存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形成的两个组织架构上：一个是G20多边对话机制，这个机制下，着力强化金砖国家多边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依托稳定在G20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个是疫前活跃的三大国际经济协调组织，即世界银行、IMF和WTO，积极支持并参与这些组织的改革，稳住在这些国际经济协调组织的影响力。

第二个是双边与次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当力争两个避免：一个是避免中美“脱钩”。中美关系关乎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看到，两国自建交以来经过长达将近四十年的双边互动，经济、产业联系紧密，不可能在短期内断绝关系。当前和今后，当竭力避免双边关系破裂，走向全面对抗。另一个是避免另“组群”。尤其要避免仿照美国牵头的“五眼联盟”那样的集团。一旦走上另组群之路，就可能导向与发达经济体脱钩，在科学技术发展、产业升级方面失去优良的国际经贸合作伙伴，因而缩小近朱者赤效应。

第三是用好手中两张牌：一张是市场牌。14亿中国人全部脱贫进入“小康”，意味着中国

已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全球最大的市场在形成。世界任何一家大企业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和它们与这个市场的联系程度为转移。另一个是区际分工牌。历史地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经贸一边，国内区际贸易和投资流动发展潜力未有充分发掘出来。14亿人口与多样化的地区，意味着中国可以自己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内产业链体系，以国内贸易代替部分国际贸易。

作为体制转轨经济体，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最大潜力，在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这一组合牌，不仅是以往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相对强盛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从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利益的组合牌。

### **包卿（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研究中心）：**

自大航海以来，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利弊兼具、建设与破坏同在的重要发展过程。全球化和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一样具有相似的进步性和挑战性。我们认为新一轮全球化将具有五个显著特征：绿色全球化、制度全球化、区域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和都市全球化。也即：全球化将更加关注人类面临的整体性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化将在政治、经济、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为基础的制度相近国家深度展开；随着旧的制度规则和平台呈现加速解体和重构态势，全球化将出现新的分群化、区域化；新一轮以数字智能化为核心的科技革命，进一步推动时空压缩、跨界交流、反身多尺度的互动联动，基于知识的、数据的、科技人才的全球化交流将更加活跃；全球化枢纽将更加突出全球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国家更多地以全球性大都市、城市群、都市圈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需要强调，全球化不是单向度的，地方受到全球化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互动的、回响的以及地方走向全球的“地方全球化”过程。所以，全球化更准确的界定应该是“全球在地化”或“全球地方化”。当我们谈论中国特色与民族复兴时，需要把国家置于与全球力量交融的时空情境中。只有这样，民族的也一定会是世界的，而民粹主义最终只会走向封闭、落后和衰退。

中国是推进全球化的积极行动者。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是，过去中国的全球化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客场全球化”。最近，“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双循环国家战略”的提出将推动从“客场全球化”走向“主场全球化”，将有力推动中国从被动适应全球化到主动引领全球化。抢抓新全球化红利，主动适应新趋势，努力引领构建全球化新格局，将是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大方向。

###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全球化既有以国家为边界的个人、企业、政府利益或价值动机驱动的一面，也有以国

际分工为组织形态的技术性演化的一面。前者或表现为动力，或表现为阻力，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波动性；后者则决定着全球资源日益深度化和广泛化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技术性关联，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确定性、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势不可逆，只是利益或价值博弈会阶段性干扰其进程。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实践看，兼具意愿与能力的国家作为国际分工中心，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建构国际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范式。及至二战结束，这一范式大体经历了英国（西欧）中心向美国中心的演化，并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中心为内核，以西欧中心、日本（日韩）中心为战略支撑的 G7 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当下的变局，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并有成为新的国际分工中心的趋势。新的国际分工中心与既有的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中心之间，产生日益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博弈，经济全球化进程由此进入动荡期。

跳出意识形态维度的大国博弈叙事，回归经济全球化之国际分工演进逻辑，新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国际分工中心不断涌现有其客观必然，也必然带来国际生产方式变革，区域或全球亦将由此而获得新的分工合作机会。作为新崛起或者说崛起中的国际分工中心，中国应该：（1）努力维持与既有国际分工中心的联系，并在国际分工中心层次构建更为平衡、更可持续的大国关系；（2）在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市场需求、要素禀赋、制度供给等维度全方位增强内源型国际分工动能；（3）以深化和升级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为基础，建构国际分工合作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新范式。

#### **杨枝煌（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化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和必须尊重的客观历史进程，全球化没有终结也无法终结，只是有新旧全球化之分，代表旧全球化的组织或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全球化制度规则或平台机构将不断出现。

当前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突破，也就是很多国家倡导的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 TPP、TTIP、TISA、CPTPP，主要趋势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开放标准。另外，从“脱钩”语境看，全球化更是一个无法抹杀的现象和实践。任何两个国家也无法完全脱钩，中美更是无法完全脱钩。即使中美断交，很多民间团体或者双方亲属也可以通过第三方进行沟通交流，经济交往更是可以通过第三方进行贸易。就连美国一直推进的科技脱钩，虽然国防军事科技完全脱钩，但在民用科技领域只能部分脱钩或有限脱钩，美国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也需要足够庞大的应用市场。总之，全球化没有终结，完全脱钩更不可能。

#### **孙时映（云南省政协研究室）：**

全球新冠疫情以来，世界经济受到供给不畅、需求骤降的双重冲击，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在断裂中加紧重组，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判

断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经济与政治深度融合，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干预显著增强。二是基于规模效应、比较优势理论实践上的“买全球、卖全球、全球产”，被经济资源、要素配置的集团化、区域化布局所冲击，过去的纵向长产业链细分，演变为更短更块状化的产业分工。三是受政治意识形态和所谓价值观捆绑，美国主导、以关键核心技术、金融结算体系为主要手段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去俄化、去中化”的脱钩断链战略意图日益明显。

###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大航海的勇气和力量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贸易时代；1765年，瓦特改良了纽卡门蒸汽机，使其在工业领域迅速推广应用，以工业化的澎湃动力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生产—消费的时代，机器生产的工厂从此出现，以此为基础后来又出现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甚至超越了国家力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跨国公司“盈利第一”的原则决定了全球化以成本逻辑推动着产业转移。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尤其新世纪初以加入“WTO”为标志融入新一轮全球化，成为产业大转移的直接受益者。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力量开始强化，发展与安全成为全球化的新主题，“成本逻辑”与“安全逻辑”相互叠加，产业的回流与转移同时存在。这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需要从“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从中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向“构建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更加紧密地从中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我国目前正处在产业大转移的漩涡之中，必须紧紧抓住跨国公司仍然是利润至上的成本逻辑，但又增加了高度关注供应链韧性的安全逻辑的特点，想方设法增强我国产业链韧性和资本粘性。坚定地立足产业安全性、独立性，牢牢地与全球产业链“缠抱”在一起。

### 杨秀伦（贵州经博智库）：

当前形势下，我认为全球化的总体趋势难以逆转，但必然面临分化或者区域化。美国恐将以价值观等理念为由，牵头将北约集团由军事组织逐步演化为政治经济组织。为应对美欧等的新结盟，俄罗斯可能将升级集体安全组织，而拉美、东南亚及非洲的主要国家等，将游离在两大阵营之间，不愿明确站队。

这只是预测性分析，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建议：一是加大开放，尤其是在投资领域，采用“搂抱”战术。中美贸易战及疫情以来，美国和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其企业迁出中国，但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利益，真正响应的企业并不多。为此，我国可以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吸引更多欧美资本，让双方利益“搂抱”在一起，增加脱钩、分化的成本。二是拓宽发声渠道，强化与西方沟通。三是优化和提升国家外交。面对新一轮全球

化发展，我国更需要价值观外交、软实力外交的进一步优化提升。

**杨上广（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以WTO为主要运行规则，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力量，以商品贸易为载体的一次全球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空间重新配置，以及商品等在全球相对自由的流动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主动参与全球贸易和劳动地域分工，通过低成本竞争优势获得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实力在全球所占比重的上升对话语权、游戏规则和治理架构提出了一些新诉求，而发达经济体由于实力下降产生了经济全球化使其实力“受损”的感觉。重构二战后原本的游戏规划成为欧美和新兴经济体的共同诉求，但在重构和重塑新规则过程中带来了各种力量的博弈、交锋，这使得“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慢全球化……”等各种思潮涌动，并激发对传统全球化的反思。

未来全球化会不会让步于区域化和本土化，“效率优先”的传统全球化理念会不会让步于“安全优先”理念仍然有待考察。分工、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带来效率的提高会提升全球福利仍然是大部分人的共识，这就必然会使许多国家仍然会认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和体系。但以经济安全和经济韧性为目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思潮正在成为一种对传统全球化反思的主流思潮之一，应该引起各界重视。

如果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旋律，那么通过谈判和博弈，最终世界各国仍然会妥协，寻找到新的适应各方力量均衡的全球化游戏规则。因此，凝聚共识，坚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交流自由化，反对世界科技、经济、文化等脱钩应该争取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和主流思想。作为新兴经济的主导力量之一，面对逆全球化的思潮，中国应该：（1）努力维持与欧美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避免与欧美国家硬脱钩，从而给中国发展带来不利的外部环境；（2）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合中国的各种要素资源，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基石；（3）整合“一带一路”、RCEP等国际区域合作战略，为国际大循环提供外部基础；（4）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战略，通过高水平的新型对外开放战略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5）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应该相互配合，达到有利于我们的“再全球化”战略。

**张得煜（苏州百年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但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各种不平等，各种危机频繁发生，特别是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经济全球化遭受重创，许多国家对旧有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直接相关。以“新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逆潮无疑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一是加快推进双循环战略，特别是刺激国内市场需求，稳住我国经济发展大盘。二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优化我国营商环境，进而吸引外资持续不断地流入我国。三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力和地位，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 全国统一大市场，究竟要统一什么？

2022年8月10日

## 逯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对企业发展而言，最应该统一的是各地的行政执法标准。很多事情是各地重复检查，一地一个尺度标准。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出台政策，引导各地形成手续简单透明、企业可预期的政策。同时，利用大数据智能辅助等手段，大幅度降低各地形成统一政策的基础成本。

## 汤秀平（上海钧智律师事务所）：

主要是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包括平等的市场准入与保护、均衡的监管与执法。积极发挥法治的保障和引导作用，消除地方保护及行政垄断，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

## 崔卫东（蓝鲸咨询）：

关于在都市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试验区的建议：都市圈是以合作发展为基础的空间区域，自愿参与，自觉合作，行政层级干预较少。我国都市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较佳试验区。都市圈跨省级行政区、空间范围明确、行政级次适度（除少数都市圈以直辖市为中心城市外，大多数以副省级和地级城市为中心城市）、合作机制联通、具备制定相对统一规则的基本技能。在我国已有研究的20多个都市圈中，支持国家批准规划的都市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试验区，制定跨行政区划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规则，流通网络、信息交互、平台优化等联通标准。根据都市圈资源禀赋，建设数据、技术、生态、新能源及能源、资本及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和资源市场。

## 徐天舒（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主要是统一市场规则。改革开放前23年，主要执行的“引进来”战略，所以各地“摸着石头过河”，各显“神通”招商代工；改革开放40周年期间，主要执行的是“走出去”战略，力争增加出口，做大做强；但2018年后，无论是国内的资源约束，还是国外的各类压力，都要求形成以国内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因此要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来促进内需、吸引外资、统一各地市场规则，打破地方垄断。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改革“深水区”。

**顿文聪（湖州市区域合作办）：**

作为基层政府，现在仍是以实际利益或荣誉称号为考量参与国家战略或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根本。很多战略推行疲软，说到底还是考核指挥部的风向问题和指标设置问题。至于考核如何有效推动发展，见仁见智。但统一大市场如果能够推行，必将为基层政府减负。最主要的是要：统一敬畏市场经济的思想认识，统一依靠市场经济的改革精神，统一利益共享的共赢理念，统一利益分配的互补机制。在这样的基础上，调试新的考核机制，统一大市场也好、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也好，均会有更深入的推进。

**陈淑梅（上海外国语大学）：**

因为行政壁垒和市场扭曲导致的成本有多大？个人建议，开展如欧共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的“没有统一欧洲的代价”的研究，对我国没有统一大市场的代价以及代价转换成利益的好处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调研，形成如《1992 欧洲的挑战——统一大市场的利益》这样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有利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大市场的建立。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计划经济的生产统一，而是对区域内所有市场主体实行统一标准对待。对区域外的市场主体不能采取歧视性准入许可，达到标准的市场主体都可以进入本地市场。即使在区域之间存在标准差异，但是在本区域内从事经济活动的域外的企业也是一视同仁。这样的机制下，企业可以在区域内平等竞争；区域间又可以设定不同规则来吸引市场主体，然后在区域间形成竞争，最后使得区域间规则趋同，达到资源在全国市场的最优配置。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欧盟作为国家联盟，在让渡部分国家治权的前提下追求市场统一，从而获取“大”市场的红利，确有值得借鉴之处。反观我国，更有超越欧盟的先天和潜在优势——我们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从国内市场分割入手更能达成建设统一市场的共识。有哪些现象导致市场分割从而降低市场效率？导致市场分割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以全国高速公路路网为例，各地不同的限速标准，以及各种“断头路”，都明显地降低了交通、物流效率。其背后，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积弊。所以，统一大市场实质上统一的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规则，意在约束和规范权力，进而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的高水平市场。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全国统一大市场究竟要统一什么？以目的来讲，全国统一大市场，目的就是要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制造的障碍。因此要统一什么？就要从这里来考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首先要让各种各地方各自规定的法规、障碍等的信息透明化，并接受公众的监督。且这些规定必须符合中央的规定，例如有些地方各自的规定，比如近些年来为了疫情的防控，明显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但是这些规定都比较空洞，没有监督，没有处罚，没有明确的办法，导致地方的加码、社区的加码。其次，如何降低成本呢？减少要素流动的障碍，这包括了个人档案保险等的转移，人（含户口，教育，医疗，各种个人账户的基金）的流动。最后，各地人为制造的各种障碍的问题。建议中央层面公示一批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

**谢杰（浙江工商大学）：**

通过统一与地区、个人身份、市场主体相匹配的市场准入权利与义务，打破阻碍市场发育、要素流动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各种壁垒和条条框框（条条一般指行业垂直壁垒，框框一般指地区水平壁垒），从而促进开放、有效、充满市场活力和循环畅通的全国统一共同市场的健康发展。

**阳旸（湖南师范大学）：**

金融与资本市场的统一。减少金融与资本市场附着的行政隐形壁垒，能更好促进制造业跨区域的融资，也能更好促进资本跨区域的合作，而且还能打通横向纵向金融监管梗阻、推进统一的金融大监管。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统一大市场主要指统一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因为当前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使得资源根据政府的意愿而不是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这也是市场导致扭曲和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因此，统一大市场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市场准入条件，统一市场交易规则，统一市场监管标准，统一市场法治体系。当前，地方行政分割是建立统一大市场的主要障碍。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导致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等统一大市场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国内市场规模无法做大，要素配置效率难以提高。只有统一市场准入条件，交易规则，监管标准以及法治体系，才能让不同市场主体在统一大市场中自由流动，公平竞争。

**罗志高（重庆工商大学）：**

政策法规一致性和协同性，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各自为政等。

**韩超（东北财经大学）：**

消除阻碍公平竞争的地方性以及行业性的保护壁垒。

**张晓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商品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果，在考虑运输成本后各地区商品价格基本符合一价定律。但要素和资源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不显著，是未来建设的重点。构建要素和资源全国统一大市场，理论目标的第一步是要实现同一产业内同等质量的要素和资源的报酬或收益在不同地区相等；第二步是实现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报酬或收益相等。

**闫浩（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人们常说巨大单一市场是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巨大好理解，整个西方世界（五眼联盟 + 欧盟 + 日本）人口加起来不到 11 亿人，没有超过中国。由于技术先进性和规模经济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形成正反馈循环，因此 14 亿人的巨大市场使中国企业的生产规模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印度人口超越中国也就是今明两年的事情，但是印度人均 GDP 只及中国的五分之一，其购买力与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

单一市场一般是指由一种通用货币主导、一套法律和税务体系、一种语言和文化习俗（民族的单一性）、一套商业规则和市场策略规制下的市场。欧盟还不是算是单一市场，虽然货币统一了，各国的财政税收政策却不统一。欧盟的语言也不统一，美国和印度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邦）法律、税务等制度不尽相同，让市场的单一程度打了折扣。如果再考虑到社会组织程度、政府执行能力等因素，中国市场的单一化程度是很高的，这是我国的优势。

在巨大单一市场的基础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究竟还要统一什么？要统一各地、各级政府制定的制度规则吗？显然，在疆域辽阔、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中国，要求各地政府实施整齐划一的政策制度不仅不合理，也不现实。在联邦制的美国，各州都有很大的决策自主权，出台的法律规制五花八门，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统一市场的建立。事实上《意见》强调了要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在操作层面仍然给地方政府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我认为，《意见》提出的“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是我们理解“统一大市场”的关键，让人口、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无障碍地自由流动，“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这是统一大市场的灵魂和核心，是我们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最终目标。

为了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美国各州政府、欧盟各国政府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地方制定的政策法规不能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前提，是合规审查的重点。违背这个前提的举措都要被废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消除附着在生产要素之上的一切歧视性条款：

一是消除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歧视，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打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二是消除人的身份歧视，让劳动力人口能够自由地迁徙、居住、学习、就业，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享受入学、就医、社保等待遇。

三是消除要素和产品的地域歧视，让生产要素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能够自由地跨区域流动，实现在城乡间、产业间、地区间的合理配置，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离不开法治环境的支撑。对于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 苏州上市公司数地级市排名第一的密码

2022年9月14日

**编者按：**截至2022年8月，苏州全市境内外上市233家公司中，境内A股上市公司190家，数量城市排名全国第五，地级市排名第一。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46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三。苏州境内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约1.8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七。

其中，近一半的上市企业为近三年上市，后劲十足。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组织学者、官员、企业家就苏州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地级城市排名第一的现象展开了讨论：

问题一：城市孵化和催生上市公司对产业链协同有何意义？

问题二：城市政府需要创造什么环境？

**闫浩（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国都市圈经济的进阶之路是“创新尖峰+产业高地”模式，以科创板上市公司为例，绝大多数上市企业出自核心城市中的核心园区，包括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新区、深圳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等所谓“创新尖峰”。苏州除了工业园区，还有6个国家级园区位居全国制造业百强园区前60位以内，正是这种以都市圈的创新尖峰与周边制造业高地协同发展的空间范式，塑造了产业链协同发展生态，形成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上海都市圈的人口与经济规模在中国四大领先型都市圈中遥遥领先，是创造中国经济增量的核心区域。中国都市圈中核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共振十分显著，而苏州与上海之间的联系度是我国所有都市圈中最高的，比北京—廊坊、广州—佛山和深圳—东莞的联系度分别高1.2倍、1.3倍和2.7倍。我认为，这是苏州经济得以超常规发展、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的背景与区位条件。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上市扶持政策其实对催生上市企业公司作用的越来越有限，苏州对创新创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集群的支持对企业上市有更深远的影响。苏州上市公司对产业链协同有两种典型模式：一是生物医药产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融合驱动产业链引领协同模式。二是电子信息产业

为代表的资本规模转型驱动的产业链嵌入协同模式。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仅仅是上市）对生物医药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产业链协同发挥了不同作用（当然产业链特点本身就不同）。

功夫在诗外。无论是上市公司培育还是产业链协同，苏州企业家普遍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和意愿，但苛刻地说，现在缺少的是科技要素供给、科技创新人才保障。城市政府最重要的按照产业创新集群发展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丰富创业场景，提升城市创新要素和创新人才集聚竞争力。

### **朱天一（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从“鱼米之乡”到“丝绸之府”，再到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地级城市排名第一，在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苏州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外引向内生。即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大型制造企业落户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转向孵化并催生城市科技创新力量成功上市，这是苏州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推进产业链协同的主要抓手。其意义有二：一是加快区域产业网络形成。城市孵化的结果，不仅形成了多个物理空间资金、技术、人才、创新要素的聚集，而且让龙头企业能在就近周边找到适合的配套小微企业实现高效协作，有利于提高本地产业链的迂回程度，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产业网络。二是形成自主控制的链主企业。经过多年发展，通过引进外资苏州地方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批以外资企业为链主的重要产业。然而，这些产业的经营主导权很多都不在我们手中，企业的重要决策都要听从境外母公司的安排。在有脱钩倾向的当下，及时调整战略方向，通过“孵化+资本”运作，培育自主可控的本地链主企业是产业链得以协同的必然选择。

优秀的营商环境，既要有产业聚链成群的硬实力，还要有舒心暖心的软服务。从疫情刚开始的惠企十条、到推出受国务院点名表扬的“政策计算器”、再到年初100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改革举措和169项具体事项，处处彰显了苏州打造优秀营商环境的决心和行动。事实上，调研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企业对地方政府既不会干涉过多，又主动靠前的贴心服务的中肯评价，这既已成为苏州营商环境的鲜明标识，也是苏州今日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地级城市排名第一的密码。

### **张得煜（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的工业制造模式不断涌现，将会催生出庞大而复杂的产业生态链。城市孵化和催生以新技术为特征的上市公司，将有助于及时发现产业生态链中的“专精特新”企业，对于我国产业链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政府应该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对待高新技术企业，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历史证明，许多世界级的工业巨擘，如微软、苹果都始于作坊式的小公司。



**杨锐（苏州大学商学院）：**

发挥上市公司在产业链协同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入手：第一，在孵化和催生上市公司阶段，政策性引导拟上市公司把供应链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支持上市公司率先搭建行业级智慧供应链平台，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智慧决策和智慧协同。第三，支持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力量，创新多种协同治理模式（供应链联合体、并购、股权投资、供应链基金等），推进供应链跨地区跨组织协同进而产业链协同。第四，定期发布《地区供应链上市公司指数》，引导和发挥上市公司群体在促进供应链协同和产业布局协同中的作用。

**孙时映（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办公厅）：**

政府的有为不在多做事，尤其是不去瞎折腾去做无边界的事，而在有质量的服务，有品质的环境氛围。开放协同、产业基础扎实，文化底蕴深厚，贴近大上海，分享经济要素外溢，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打造苏州工业园，形成聚集效应，这些都对苏州提升城市孵化功能，大量催生上市公司，推动工业第一市成熟成型，推动长三角产业协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开公平，开放有序，鼓励竞争。少讲空话大话，面上硬件方面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水电路通讯数据等公共基础设施；软件方面多为企业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点上为具体企业合法办实事、解难事、不推事。

**史凯忠（泰州市发改委）：**

城市孵化和催生上市公司激发创新了活动，调动创新积极性。对此，政府作为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其次规范的营商环境，第三营造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

**邵斌（苏州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健康的上市公司所建立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内部监督五要素，这些规范有效的公司信息生态环境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对产业链协同会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实现公司的创建发展并购重组基于价值创造和协同。

**郝良峰（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对上市公司的孵化，不仅可以激发城市资本市场潜能，还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提升，在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创新链过程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事实上，在今年苏州新增10家上市公司中，大部分与半导体产业相关，将助推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姜能涛（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

首先，上市公司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可以主动承担起链长的角色，造就一批“本土化”

的链上配套企业，为强链补链固链做贡献；第二，上市公司的孵化催生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集聚，可以促进产业集群的打造和创新生态的营造。第三，上市公司承担着引领本土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使命，特别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政策环境，对关键重点领域企业实行“一企一策”专项扶持；第二是金融环境，政府要引进金融平台，如苏州“太湖金谷”与各交易所达成深度合作，以此为抓手通过一系列预备、问诊等举措实现了企业需求与金融服务的精准对接。

#### **胡艺（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

孵化和催生成功的上市企业，会吸引大量长期稳定的资金流入，优质战略投资者加入，高端生产要素（如高新技术以及人才）循资进入，再加上与PE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并购基金，可放大投资能力，通过持续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增强关联企业间经济技术互动，优化产业链各个环节企业空间布局，强化分工协作，从而促进地区乃至国家产业链协同发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佳利用。

政府主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引导。做好市场调研工作，前瞻性规划产业发展战略，引导社会资源进入。二是服务。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如优质及创新制度）以及“硬”环境（如工业以及生活基础设施等）。

####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世界500强企业研究中心）：**

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上市公司数量，特别是上市公司质量正相关。苏州A股上市公司尽管数量前列，但仍存在的市值规模偏小，特别是百亿市值规模以下的数量太多。实践证明，万亿GDP俱乐部的城市，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孵化、催生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上市公司。反之，一定数量质量的上市公司能支撑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对聚焦城市主要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讲，苏州一定要大力发展以卡脖子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特别是在专精特新企业的孵化走在大城市的前列，提高数字经济在GDP的比重。

城市高质量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定数量质量的上市公司。迫切需要政府创造创新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为企业家精神培育创造良好的条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护企业家发展的信心，消除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政策的冲突、误解和分歧。

#### **包卿（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研究中心）：**

产业链协同需要企业、资本、人才、信息、政策的融合互动，其中资本是粘合剂和催化剂，资本具有灵活性、穿透性特征和组织赋能功能。城市孵化推动上市公司发展，是推动产业链集聚、稳定、转型提升的重要抓手。对此，政府着力推动三大环境：一是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形成多主体制衡和动态均衡的现代治理结

构；二是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市场环境，推动和提升城市生产与贸易网络发展；三是知识驱动的创新环境，增强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优化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徐天舒（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

城市孵化和催生上市公司对我国产业链协同的意义在于：（1）通过直接融资的形式培育和支持产业链中的头部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2）无论是股票交易所之前的审批制、核准制还是如今推行的注册制，无不体现了明确的产业政策支持方向，因城市上市公司数量的提升，能够实现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推动国家、地区的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3）城市上市公司数量的提升，能推动产业集群的生成，促进产业链协同的效率。

孵化和催生上市公司，城市政府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1）锻造产业基础。苏州大量企业的上市是苏州40多年来，从乡镇企业到外资企业到民营高科技企业不断做强做大制造业的结果；（2）要形成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比如，重点打造“银行+财政”联动，发挥风险补偿资金池兜底作用；“产业+基金”联动，积极培育先导产业等措施；（3）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例如，各委办局专门设立了产业推进的职能处室，例如苏州市工信局设立了医药产业处、智能制造处和信息化推进处，园区经发委设立了产业发展促进处等；设立了大量企业服务中心，开展政策计算器服务，将惠企政策的被动申报变为主动的政务服务。这些都是具有苏州特色的做法。

# 如何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2022年11月8日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许多重要论述，报告指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和无锡研究中心组织产学研政各界，就如何更好贯彻落实二十大关于支持民营企业精神展开讨论。

##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改革开放证明，民营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中央政策方针很明确，重在落实，为此，基层党政：

一是要充分认识民营经济事关发展全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增强“民营企业就是地方经济最大优势”的共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民营经济兴则地方经济兴、民营经济强则地方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强”的动力源理念和团结民营经济人士、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的发展观。

二是要发挥地方党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统筹牵头作用，营造争先创优工作机制，坚持激发整体工作活力，调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围绕“干什么”，系统谋划工作和政策体系，领导工作全力推进，围绕“怎么干”，构筑从省、市到县区强有力的组织架构和运行体系，发挥好基层改革的主动性，形成上下联动全阵地推进格局。

三是要坚持政策精准有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改革发力，超前研究谋划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各类支持性政策，持续开展“推新政破堵点”行动，做足政策的储备和滚动推出，出台一批引领性、突破性和创新性的政策，持续不断完善政策，政策的稳定性、可及性和透明度不断提高，增强政策含金量和精准有效性、可操作性。

四是坚持优质服务常态化，坚决构建和落实亲清政商关系，在为民营经济全力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中充分体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论断，真心实意帮助民营企业解疑释惑、排忧解难，让民营经济人士感受到更多的尊重感、归属感和获得感，激发更大创造创新精神，持续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以企业需求和市场评价为服务准

则，建立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把“店小二”的服务精神、服务意识转化为日常行动，寓监管于服务中，通过实实在在的服务创造优质营商环境。

**白明（商务部研究院）：**

对于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已经取得广泛共识。对于引导两个字的理解，既包括希望让民营企业干什么，也包括希望民营企业不干什么。对于希望让民营企业干什么，也很好理解。但对于希望民营企业不干什么，也有一些政策，但是希望这些政策更加透明，更加公平。

**王海平（21世纪经济研究院）：**

报告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非常关键。从本人在实践中接触大量涉及民企的案例看，一个重要的共性是，当民企的产权和企业家利益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协调保护的时候，会出现“新官不理旧账”，导致无法推进。“新官”的态度有理有据：历史的争论与自己无关，更不想被“嫌疑”。故此，出现一个“死扣”，导致事情无法解开，最终受伤的是民企。建议：对于一些具有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具有争议的遗留问题，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需要更高层级的协调。

**章春鸣（吴江赛马钢架彩板制造有限公司）：**

提升营商环境仍有空间，要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及责任，细化责任清单，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积极开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三项行动，能有效帮助企业解决疑难问题。能以营商环境提升为契机，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对服务窗口办理事项充分授权，真正实现一次性告知制度，让企业群众少跑路，提升政务中心窗口服务效率，能真正实现营商环境中各个环节“最多跑一次”的办理模式。

**王丰（江苏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作为外向型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地区，伴随着国内外叠加的双重压力，不少传统制造企业目前普遍遇到了增长乏力，市场萎缩、产能过剩等实际困难。对于这些行业，要精准支持民营企业敢于直面挑战，以 APEC、OECD、RCEP、CPTPP、EEU 等参与国家为跳板，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向东南亚、东欧、中南美洲迅速转移冗余设备及人员，凭借当地丰富的劳动力红利、庞大的内需和其自贸协定缔约各国之间的关税优势，既降低了成本，满足了客户需求，又转移自身过剩产能，更避免了欧美长臂管辖和关税壁垒，继续抢占全球市场。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应大力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创业板和中小企业债券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多样化、灵活的资金支持。鼓励保护企业家和关键技术及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股权

激励和资本市场获得对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的回报。

### 曹荣庆（浙江师范大学）：

当前，民营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几乎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一两家经营得比较成功的民营实体企业。仔细考察一下这些比较成功的民营实体企业，可以发现有两个重要的特质：

一是坚守初心的实体感。浙江温州的皮鞋行业，在被福建晋江和莆田抢走旅游鞋发展契机的情况下，整个皮鞋行业产值仍然可以达到 1500 亿元左右，这显然要归功于一批温州企业家 30 多年来对皮鞋行业耿耿于怀的初心而培育形成的强烈的企业实体感。

二是满怀野心的工匠精神。这个方面我了解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双童吸管，公司是怀着“垄断”吸管行业的“野心”，坚持以工匠精神来制作吸管，终而在占有中国吸管总量 3/4，全球吸管总量 1/3，全球吸管专利 2/3，每天生产 17000 万根吸管的强大光环下成为吸管行业的全球龙头老大，“回过头去看看不见第二名在哪里”。

由此可见，如果每个民营实体企业都可以坚守初心，满怀野心，兢兢业业地以工匠精神来养护实体感，那么成功就几乎是必然的。

### 俞国军（浙江省委党校）：

在共同富裕历史阶段要发挥民营经济更大作用，当前民营经济存在的战略困境，不仅仅在其经济发展方面，更在其如何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飞跃。然而，在特定制度安排与经济自然规律下，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财富向发达地区集中、向城市集中、向高收入群体集中，形成了较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三个主要财富分配格局。

随着我国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历史阶段，民营经济需要承担更多历史责任——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做大做强基础上，更好推动中国经济平衡发展。第一，顺应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在加快经济升级、社会升级、环境升级同时，将产能布局到落后与欠发达地区，构建以发达地区为核心、以落后发展地区为支撑的国内生产网络。第二，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带动落后乡村发展致富、改善村貌。如杭州滨江集团在淳安县胡家坪村启动旅游综合体项目，不仅让村貌换新颜，还让民房发挥经济社会价值，让村民们实现致富。第三，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劳动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如吉利集团发布“共同富裕计划行动纲领”，实施以全员收入增长计划、全员家庭健康保险计划、全员职业提升计划等举措，在提高企业员工认同感同时，实实在在提高员工获得感幸福感。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对民营经济认知上的偏差是影响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的系列重要论述，动员全社会形成对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的统一认知。具体来说可以通过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党委政府全局性定位推动，将“两个健康”作为牵引性、全局性、龙头性的工作，建立主要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二是全链条构筑高效组织运行体系，建立促进“两个健康”组织架构，实现实体化办公，清单化推进。三是建立先行先试政策制定实施机制，深入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现状、机遇和挑战、优势和短板，制定“两个健康”工作责任清单。四是常态化、节点化谋划活动营造氛围，按照“月月有举措，季季有亮点，半年有总结，年年出成果”的思路，对重点工作进行系统谋划，保持良好的创建氛围。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民营企业之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特殊的“56789”效应。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首要任务和第一要务，无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此，要以稳预期为突破口，致力于促成多元任务与民企发展的双向奔赴。其一，尽快启动《民营企业促进法》立法工作；其二，中央和地方政府系统性清理涉民企的制度性壁垒，从制度上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公正竞争；其三，依法鼓励、支持链主型民营企业，帮助其基于市场规律、价值链规律打造链式生态系统，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高水平合作。

**魏建（山东大学）：**

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障碍在于金融支持不够。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要求，银行严格按照贷款必须有抵押的原则进行要求，而多数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缺少足够的抵押物。实践中，以蚂蚁金服、微信等网商银行为代表的新型金融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小微企业的资金主要供给者，借助于大数据优势发放贷款不需要抵押，不良率反而很低。这就要求银行等在中央“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下，深入对比分析自身业务模式存在的不足之处，依靠抵押进行融资的模式，看起来安全但实际上并不能有效抑制不良的发生。积极利用金融科技开发以企业运营数据为基础的新贷款模式。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银行的健康发展，但是地方性银行往往因为能力、规模有限导致开发成本较高，且很多数据分散于众多政府部门。政府的数据管理部门应推动建设数据基础平台，来为地方金融的发展搭建数据基础。

**郝良峰（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充分释放市场机制调控潜能和激发民营企业创新精神的重要前提。《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我国改善营商环境奠定了法治基础，但还缺乏完

善的法律体系支持。因此，还应当从商业行为和政府执法等不同程序环节做出更详细的法律规定，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产权和合法权益。同时，通过立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杜绝增设不合理市场门槛、不守信不履约、滥用司法权力等有损民营企业权益的现象。

**邵斌（苏州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围绕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构建智库型战略传播体系可以助力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建设改善。苏州作为国际化格局工业强市，媒体智库联合高校共建联合传播工作室等机制，发挥“新闻事件+数据可视”的复合作用，配合政府开放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服务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建设，在泛政务领域，包括媒体传播决策，舆论影响决策，政策实施决策，公共安全决策，也包括品牌传播决策，营销决策，消费者洞察，活动传播决策市调咨询决策等。

**姜能涛（苏州市职业大学）：**

保证政策落实和一致性至关重要。中央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各地政府要落实好二十大精神和政策条例，在要素获取（资金、土地等）、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让民营资本与国有、外资享受同样的待遇，“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断改善企业家的预期，为其提供广阔的创新创业沃土。

**张得煜（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制保障，也为民营企业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成果与产业的融合日新月异，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些科技创新公司在发展初期，一般都是以民营企业的形式出现，且规模不大。为了让这些企业健康发展，政府应该提供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业环境，鼓励创业者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大胆尝试，容忍各种形式的试错，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的权益，让企业家们具有不竭的创新动力。

**宋文阁（经济研究人士）：**

一是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就是要协同好、维护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两者的关系；二是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国有资本的主战场是构建世界一流企业，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本，战略支撑中国经济。民营资本的主战场是发展专精特新并且成为必由之路，发挥好“56789”功能作用，特别是成为保障就业中主力军；三是深化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特别是在招投标、税收、金融等扶持力度，对于 1.1



亿个体工商户，法规政策公平公正公开，可采用一刀切办法。比如所有税收都5年内一律减免，所有的银行资金一律在基准利率之内，可以有效减少监管难度，更好的执行个体工商户条例。

### **赵春艳（江苏大学）：**

民营企业跨区域并购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大有可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可以从竞争性领域的重点行业入手，推动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跨区域并购和经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一是建议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的标准入手，实现新能源车企跨区域并购的基础设施一体化；二是推动新能源车企发展相关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包括高等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数据，创新的共担共享；三是要设计跨区域并购相关主体的利益分享机制，推动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的政策变革，建构各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制度基石，降低“行政区经济”对新能源车企跨区域并购的隐性影响。

### **徐天舒（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

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石。在大量的调研中，不少民营企业强调，他们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却希望拥有平等的市场地位。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应该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在市场监管执法过程中，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 **包卿（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研究中心）：**

我认为，二十大报告关于民营经济重大论述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毫不动摇鼓励、支持民营经济（非公经济）发展；（2）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第三句话，重申了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奠定机制性保障，有利于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近期我们对典型民营企业的调研发现，虽然我们政策鼓励支持民间资本通过PPP等方式，参与盘活国有存量资产，鼓励民营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并购重组等方式，盘活自身资产。但现在的地方国企改革以后，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把各类发展的包袱、历史包袱都交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地方融资平台载体，承担了政府城建、交通、公共服务等重要功能，其特征是重资产、低收益，而且现金流业务非常稀缺。这就导致民营企业参与到国有企业的资产盘活难以展开。另一方面，一些能产生营收的具有市场化机制的创新型混合所有制公司，在严格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要求下，决策流程长、容错能力差，导致可以通过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去共同延伸的创新业务难以展开。这些问题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